

## 目 錄

- 一、無產階級專政与消滅剝削的途徑、方法和形式……( 1 )
  - 1. 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 1 )
  - 2. 無產階級專政条件下消滅剝削的途徑、方法和形式問題……( 7 )
- 二、論我國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方針……(16)
  - 1. 我國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和平改造方針的客观条件……(16)
  - 2. 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內容……(25)
  - 3. 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与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决定性勝利……(39)
  - 4. 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与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44)
- 三、逐步改变資本主义企業的生產关系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51)
  - 1. 我國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畸形状况及其在經濟恢复时期的發展……(51)
  - 2. 國家資本主义發展的特点……(59)
  - 3. 消滅階級与个人改造，改造企業与改造人相结合……(69)
- 四、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新階段……(76)
  - 1. “定息”对于改变生產关系的作用……(76)
  - 2. 新条件下經濟改組的意义……(82)
  - 3.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問題……(91)
- 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勝利……(99)



# 一、無產階級專政与消滅剝削 的途徑、方法和形式

## 1. 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

我國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形式。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必須因不同的國家出現不同的政治形式，但實質上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实现向無階級社会的过渡，就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不能使劳动在經濟上獲得徹底的解放。我國过渡时期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为前提的。

馬克思主义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是从关于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原理發展而來的。为要消滅階級，解放劳动，徹底解放社会生產力，就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争。階級斗争必然導向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只有通过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通过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來完成。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最發展的階級斗争，是徹底消滅階級的手段。所以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学說，从承認階級斗争擴展到無產階級專政以后，就把階級斗争的学說發揮到底了。于是，社会主义才最終地从空想的發展为科学的了。

因此馬克思指出，發現社会上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的現象，并不是他首先發現的，在他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学者就已經發現了的。馬克思說：“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証明下列几点：（一）階級存在僅僅是跟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联系的；（二）階級

斗争必然要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三)这个專政本身不过是進到消滅任何階級和進到無階級社会的过渡……。”<sup>1)</sup>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是馬克思主义关于階級斗争学說的最主要之点。馬克思在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以后，把無產階級建立的这种政治統治，称做“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sup>2)</sup>

因此列宁在“國家与革命”一書中再三指出：如果僅僅承認階級斗争，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还没有越过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范围。只有把承認階級斗争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而这一点，就正是“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区别”。<sup>3)</sup>

然而，当欧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在歷史的實踐上，开始把無產階級引導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时候，就出現了一批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他們出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用“割裂馬克思主义，曲解馬克思主义”<sup>4)</sup>的方法，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企圖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以致把它变成为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争的武器。他們口头上承認馬克思主义，实际上背叛馬克思主义，成了馬克思主义的敌人。

著名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首先出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他甚至認為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的不可避免的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是由于馬克思的失言。他把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階級不应当簡單的握取現成的國家机器，應該以一種國家机器代替另一種國家机器的原理；曲解为好像是馬克思警告工人階級在夺取政权时，不要采取过分的革命手段。他把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的原理，曲解为國家是調和階級矛盾的

---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下册，452頁。

2) 同上書，上册，第501頁。

3) 列宁：國家与革命，解放社版，47頁。

4) 同上書，47頁。

机关。按照伯恩斯坦的公式就是，“运动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得什么”，就是说工人运动不必导向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取某些改良的斗争。从而也就最终地用阶级合作的思想，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后来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首的机会主义者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们用各种办法来曲解马克思主义，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曲解为是指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和平地获得大多数，曲解为是从所谓“纯粹民主”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状况。考茨基用所谓“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的概念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民主，从而也就是从实质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有这些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者，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出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也就最终地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所有以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都已经破产了。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为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

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同任何发展过程一样，它不是按直线式向前行进的，而是按曲线式、螺旋式向前行进的。因此革命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有和平发展时期，也有战争时期；有革命的准备时期，也有直接冲突时期，这正是发展过程的辩证法。但是当发展中出现每一迂回曲折，每一个转折点，就要产生一些动摇分子，产生一些修正主义的思潮。如果说以前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潮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十月革命时期的话；那末，最近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思潮，就是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和另一种历史转折点上的产物了。如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出现了一批修正主义者，出来把冲突解释为缓和，把斗争解释为放弃斗争的话；那末，最近以来的修正主义思潮，就在于把进

步解釋为后退，把勝利解釋为失敗，把無產階級專政實踐过程中產生的某些缺点，誇大为本質的东西，从而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出現了兩大陣營，社会主义已經这样地深入人心，共產主义运动進入了一个新的發展时期。馬克思主义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原理已經經過了歷史的實踐的檢驗，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被証明了是使劳动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是消滅階級和解放劳动的必經之路。但由于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也是按曲綫式、波浪式行進的，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在自己的實踐过程中，也產生了某些缺点和錯誤。苏联共產党第廿次党代表大会中總結了勝利，也揭發了一些錯誤和缺点，这恰恰說明所有这些錯誤和缺点都是可以糾正的；恰好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恰好說明了社会主义將獲得更大的發展，將从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然而就在这个轉折点上，又產生了新的修正主义的思潮。

許多以前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观点，如所謂“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理論，以及所謂“一般民主”和“純粹民主”的概念，又都整日翻新地被搬出來了。也有一些人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界限，甚至認為不經過無產階級政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也可以建設社会主义。以至認為某些資產階級國家就可以建設社会主义了。可以說，这种宣傳只能有利于帝國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对这些已經作了深刻的有力的批判，并指出：“修正主义的思潮虽然是有利于帝國主义的，但帝國主义者的行动，却并不有利于修正主义，而是在証明修正主义的破產。”（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都有修正，然而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模糊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区别，則总是修正主义者所集中的最主要目标之一。因为否認了無產階級專政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观，把它变成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因

此，修正主义的實質就在于：用“割裂”和“曲解”的方法，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性、斗争性和实践性，使之符合于資產階級的要求，成为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作斗争的工具。

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实现消滅階級和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能使劳动獲得解放。所以列宁指出：“一个階級的專政不僅为一般階級社会所必需，不僅为已推翻資產階級的那个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为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無階級社会’，过渡到共產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所必需——只有了解了这一点的人，才算是領会了馬克思关于國家学說的實質。”<sup>1)</sup>这是修正主义者所不理解的。

無產階級只有經過它的先鋒隊——共產党的領導，实行無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推翻旧政权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夺得政权以后，必須在它的政党——共產党的領導下，毫無阻碍地运用这个政权，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巩固和保持自己的專政。在無產階級的政党共产党領導下的國家，必須巩固同劳动农民的联盟，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們；必須巩固同各國無產者的联系，貫徹無產階級國際主义的精神。消滅階級和建設社会主义，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内容，因此它必須一方面向一切反抗社会主义的敌人們实行專政；另一方面，組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經濟文化生活。这一切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的和共同的方面。这一点也是修正主义者所不理解的。

然而，無產階級專政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民族中間，在其具体發展的形式上，不能不是各有其自己的特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現出來和發生作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只有同各个國家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結合，才能發生作用。任何一般的东西，只能寓于个别之中，“任何一般只是大

---

1) 列宁：《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版，36頁。

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sup>1)</sup> 与修正主义者相反，教条主义者恰好偏在另外一个片面，他们不理解一般只能寓于个别之中；他们只知道死守公式，硬搬经验，脱离实际，因而也同修正主义一样，对革命起破坏的作用。教条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是结合本国具体条件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而是生搬硬套。因而也从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因此可以说，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者都同样地把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差别绝对化，它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东西。教条主义者不知道一般只能寓于个别之中；修正主义者则不知道个别不能导向于那一般的联系之外，不知“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sup>2)</sup>，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都是绝对化和片面化的。教条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各个国家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因而在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近来修正主义者则强调各个国家的特殊的革命道路，从而直接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否认了十月革命的道路，直接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因此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必须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防止修正主义倾向；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同时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

归根结底，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现消灭阶级和解放劳动，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我国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及其在过渡时期的一切设施，在消灭剥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途径、方法和形式，都是这个普遍原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斗争以外的道路；但阶级斗争的形式，则必须以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为转移。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式，虽

1)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版，363页。

2) 同上。

然有其自己的特点，但它仍然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条件下階級斗争的一种形式，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特殊形式。沒有工人階級領導的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有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和平过渡，但这种和平过渡是在工人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权的条件下，在消滅剝削的斗争中，通过和平的斗争方式来达到目的。因此这种和平过渡，实际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特殊途径，这就是問題的实质。所以說，我國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为前提的。

## 2. 無產階級專政条件下消滅剝削的途径、 方法和形式問題

如前一節所談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但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条件下，必然要產生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十月革命勝利后，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在苏联的形式；我國革命勝利后，建立了适合于我國条件的人民民主專政，但本質上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同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途径和方法，或者是在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斗争形式問題上，也不能不是各有其自己的特点。消滅階級必須經過階級斗争，沒有階級斗争以外的道路，这是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階級斗争的形式，又必須是以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为轉移，它沒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那末，馬克思主义是怎样來考察斗争形式問題的呢？列宁說：“第一、馬克思主义与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它决不用某一种斗争方式来局限运动。”<sup>1)</sup>“第二、馬克思主义絕對要求用歷史眼光來考察斗争方式問題。”<sup>2)</sup>如果不管歷史具体环境怎样而提出這個問題，就等于不懂得辯証唯物主义的起碼要求。这就是馬克

1) 列宁：“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莫斯科中文版155頁。

2) 同上，156頁。



思主义在考察斗争形式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要求。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苏联革命的特点，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剥夺的方式，在我国条件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但本质上都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种途径和方法，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形式。显然，斗争的形式，必须符合于革命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

对于剥夺资产阶级的办法，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就指出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采取过这种方式。我国革命胜利后对官僚资产阶级也是这样作的，这一点人们都很熟悉没有什么疑问。对于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法，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也一般地提到过，我国过去七年来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了是符合于我国条件的有效方式，可以说在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然而虽然如此，或者还有人觉得似乎较为难于理解，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加以说明。

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呢？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即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很少想反对这样办的。”<sup>1)</sup>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消灭剥削的途径、方法和形式上，也必须从这个生产的观点出发。然而，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革命进程中某种斗争方式，不能脱离革命所处的具体环境。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定目标，如果革命遭到剥削者的坚决反抗，当然无产阶级就不能不用实际行动来捍卫革命的利益，采取暴力的镇压的手段，对剥削者实行剥夺。反之，如果革命进程中存在着和平改造的可能性，而这种方式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难道共产主义者还不“但愿如此”吗？

---

1) 参看恩格斯著“共产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1页。

虽然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由于俄國資產階級的劇烈反抗，实行消極怠工，敌視苏維埃政权，迫使無產階級國家采取了暴力的和剝夺的方式，在一个較短的時間內，实现了消滅資本主义所有制的任务。为了鎮压資產階級的反抗，不但剝夺了資本家的生產資料，而且也剝夺了他們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后，列宁並沒有事先預定說，革命勝利后只能采取暴力的和剝夺的方式，而不能采用其他某种方式。

反之，在十月革命勝利前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曾經反复地研究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并且力爭用比較緩和的方式來实现这个任务。列宁曾經設想，暫不沒收全部私人企業，用國家資本主义的辦法，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前，即在1917年5月列宁就曾指出过：“至于对个别的資本家，甚至对大多数的資本家，無產階級不僅不欲‘剝光’他們（如像舒里金一直在‘恐嚇’他們自己及其朋友的講法），不僅不欲剝夺他們的‘一切’，相反地，还想在工人監督之下，叫他們从事有益而光榮的事業。”<sup>1)</sup>十月革命前后和过渡到新經濟政策初期，在列宁的許多著作中，都陈述了經過社会主义的統計与監督逐漸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这里列宁所指的社会主义的統計与監督，就是國家資本主义。

就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即1917年末，苏維埃政权頒布的一些有关法令，如工人監督条例，有关國家銀行的法令和关于广告事業國家独占的法令等等，也都体现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按照列宁后来的回憶，这些法令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取得了國家政权的無產階級，假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可能較漸進的。它假定私有財產制度和私人企業都繼續存在下去，只是使它从屬於一定的國家領導，將它導向國家資本主义的軌道上來。就是銀行國有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下子就实现的，最初曾以監督銀行活动，作为一种过渡办法。

---

1) ‘列宁文集’五卷144頁。

为什么需要爭取这种較為緩和的和逐步的过渡呢？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的突然变革，可能对于社会生产引起某些破坏，引起某些不良的经济后果，当然这对于取得政权的無產階級來說，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反之，無產階級取得政权以后，要求一个有秩序、有准备和沒有特殊破坏的逐漸的过渡。用列宁的話說，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一个使旧的經濟适应于社会主义經濟的預备时期”<sup>1)</sup>，即需要經過一个國家資本主义的阶段。其所以必要，就在于使这种过渡能够逐漸進行；使这一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能够在沒有特殊破坏的条件下進行；使社会主义任务的实现，减少阻力和增加助力，因而就更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还因为在变革的方式上，不能脱离现实的經濟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在經濟愈不發达的國家里，这种过渡就愈困難。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僅有破坏任务，而且有更重要的建設任务，这一切都需要贏得時間。

那末，苏維埃政权后来又为什么采取了“剝夺剝夺者”的方式呢？这一点我們就要看当时俄國資產階級对苏維埃政权是采取怎样的态度。当时俄國資產階級对苏維埃政权采取了完全敌視的态度，在他們的劇烈反抗下，苏維埃政权的这些法令，以及类似意义下的各种法令，都沒有得到实现。就拿最初監督銀行活动的过渡办法來說，操縱各銀行的大資本家以及各銀行經理們，都惡意地对國家的訓令实行怠工破坏，不接受國家的法令，因此迫使苏維埃政权不得不很快地采用直接实行銀行國有化來代替这种过渡办法。“工人監督条例”，也受到資本家們的劇烈反抗。例如1917年12月6日全俄工商業組織代表會議和彼得堡厂主联合会，在它的決議中寫道：在向某企業要求实行工人監督制时，該企業主应关闭这个企業。“既不要任何过渡，也不要什么新制度”，这便是資產階級对苏維埃政权的回答。資產階級还实行怠工破坏，不接受國家的政策法令，不接受國家資本主义，并与外國帝國主义勾結，实行武装

---

1) “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七卷256頁。

叛亂，掀起了國內戰爭。那時俄國資產階級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國家政權這個基本問題上，集中到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上，因此鬥爭場所就不在國家資本主義方面了。

在資產階級的這種劇烈的反抗下，迫使蘇維埃政權不得不把鬥爭場所轉到鎮壓資本家的怠工反抗，和擊退獲得全世界資產階級支持的白衛軍隊上去了。從而也就迫使蘇維埃政權不得不採取有力步驟，對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施行剝奪。因而也就加速了企業國有化的發展。由於資產階級的這種劇烈反抗，激起了這種你死我活的無情鬥爭，這種鬥爭迫使蘇維埃政權對舊關係作出了比原來所假定的要大得不可計量的破壞。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鬥爭愈是困難，則謹慎地過渡到新制度中去的可能亦愈少。

當然，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的這種反抗，除了使國家和人民在革命過程中遭受了更大的困難和破壞以外，他們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列寧後來曾經這樣說過：“如果資本家老爺們在1917年10月接受了我們的建議，那他們所有的也許比現在要多五倍。”<sup>1)</sup>當然，資產階級總是要消滅的，但消滅的方式，則可以因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國家的態度而有所不同。可以說，這對於資產階級也是一個很大的歷史教訓。

但是由於蘇維埃政權被迫採取了一下子剝奪的鬥爭方式的結果，加上三年的國內戰爭，畢竟在國民經濟中，在工農業生產中引起了巨大的破壞，這種破壞給國民經濟的恢復帶來很大的困難。因此，在國內戰爭的勝利結束，以及把剝削者的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鎮壓下去以後，又不得不從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上面來。用列寧的話說，就是“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陣地上去。列寧說：“到1921年春天已經弄明白，我們在想用‘沖擊’方式，即用最簡捷、最迅速最直接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生產與分配原則的企圖上，已經遭到了失敗。1921年春季的政治形

---

1) “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版，七卷287頁。

勢，曾向我們指出，在許多經濟問題上，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陣地去，由‘沖擊’轉為‘圍攻’，乃是不可避免的。”<sup>1)</sup>所以當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以後，便迅速產生了刺激生產的經濟效果。並經過這種途徑，逐漸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使無產階級國家贏得時間，集結力量，進行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重新配置，創造了徹底解決“誰戰勝誰”問題的一切必要條件。這一切就說明了，為什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但願用和平的方法，實行有秩序、有步驟和逐漸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但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專政在實現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問題上，是暴力變革？還是和平改造？必須取決於那幾方面的因素呢？

第一、它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在十月革命勝利的時候，那時全世界剛剛出現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蘇維埃政權處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所有帝國主義者都企圖採取各種手段來消滅這個新生的無產階級專政。這便支持了國內資產階級的復辟的某種希望。而如果他們對於用最有效的手段——戰爭來解決政權問題，就那怕只有點滴的希望，“那末，他們就不可能同意而且也一定不會同意蘇維埃政權為了能比較逐漸地過渡到新制度上去，而對他們所作的那些局部的讓步了。”<sup>2)</sup>至1919年，正當殘酷的內戰時期，列寧曾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中，分析當時階級鬥爭的形勢時指出，資產階級之所以進行這樣瘋狂的反抗，是由於它比戰勝它的無產階級還較為強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還保持著自己的國際聯繫，得到外國資本的支持；剝削者還保持著金錢、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並且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等等，這些使他們獲得很大的優勢；他們還依靠著習慣力量，依靠著小生產的力量，利用小生產者動搖性以擴大自己的影響等等。在這種階級力量對比的形勢下，所以資產階級

1) 列寧：“論新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版，第14頁。

2) 同上，第13頁。

進行了瘋狂的反抗，使階級鬥爭導向了最尖銳的國內戰爭的形式。所以說，鬥爭的形式，首先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

第二、還取決於在一定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權的態度。如果沒有資產階級的武裝反抗，就不會有也不需要無產階級的軍事鎮壓，當然也沒有國內戰爭。如果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權採取簡單的敵視態度，當然就不能有和平改造。反之，如果資產階級接受了無產階級國家的勸告，接受了國家資本主義，那末，整個的事變，就將是另外一種較為緩和的過程了，就是說，鬥爭的激烈程度和採取怎樣的形態，也取決於資產階級的抵抗。

第三、同時也取決於無產階級對於階級鬥爭形式的正確估計，以及以這種正確估計為基礎的正確的政策。所以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善於考察階級鬥爭過程中的具體條件，以求隨時能夠判明局勢，作為確定無產階級鬥爭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礎。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來說，應該利用一切可能性，儘可能爭取最有利的條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所以當國內戰爭剛剛結束，列寧就提出了過渡到新經濟政策，“退却”到國家資本主義去，以及新經濟政策所收到的積極效果等等，我們就可以看出列寧政策的英明。同時，列寧還指出過：為了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如果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並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則對資本家實行“贖買”，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最便宜的。列寧在1918年5月曾針對當時情形指出：要與那些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能真正用生產品供給千百萬人的大企業的精明能干的組織者資格出現，能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如果無產階級為了爭得最有利的條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為了爭取資本家的合作和取得某種協議，無產階級付出某種代價，作某些局部的讓步，向資本家實行贖買，使這種贖買導向有利於社會主義任務的實現，假如有這種可能性，無產階級政策的作用，就具有很大的意義。假如存在着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而無產階級沒有提出相適應的政策，力爭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那末，也就不能

有和平过渡。

总而言之,作为斗争的形式来说,没有呆板不变的公式,它取决于革命运动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深刻地指出说:“战争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因地域和性质的差别。”<sup>1)</sup>又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sup>2)</sup>“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来选择实现任务的途径、方法和形式,不但在军事斗争上是如此,而在变革社会的斗争中也是如此。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善于运用适合于环境变迁的方法,来实现革命的任务和拥护革命的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伟大力量,不仅在于它的高度原则性,而且在于高度的灵活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利益,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斗争目标;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灵活性,则表现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和手段,利用一切发展的可能性,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统一的,没有高度的原则性,就要变成为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就谈不到其他一切;反之如果没有高度的灵活性,就要脱离实践,就要变为空谈的教条主义。因此无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教条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要求人们认真研究客观条件,了解周围环境,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并根据发展中新的条件和需要来改变政策。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必须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必须表现为采取最正确的途径和方法来实现革命的任务和拥护革命的利益。

1) “毛泽东选集” 2卷 170页。

2) 同上, 170页。

因此在实际斗争中，如果無產階級國家能够得到这种条件：使社会主义任务的实现，能够用逐步的和在变革中不至引起特殊破坏的方法，用國家資本主义的办法，順利地实现消滅剝削和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末，对于無產階級來說，难道不需要力争这种痛苦最少和破坏最小的条件嗎？以及为了爭得这种最有利的条件，虽然付出一定代價，向資產階級实行贖買，作某些讓步和妥協，取得資產階級的合作，难道不是更有利于革命嗎？这便是問題的實質。

归根結底，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解放社会生產力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务。也就是說，“……要把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徹底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这样的政权實質上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sup>1)</sup>至于無產階級專政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方式，是对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实行剝奪，或者是实行和平改造和贖買，則是專政在某一特殊國家中的問題。

---

1) 鄧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41頁。



## 二、論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業 的和平改造方針

### 1. 我國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和平 改造方針的客观条件

我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勝利，打倒了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以后，还剩下一个民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是要被消滅的階級。但在我國这样的歷史条件下，究竟应采取怎样的途徑、方法和形式呢？是和平改造还是强力变革？是經過國家資本主义的办法逐步贖買还是無償剝夺？有两个途徑和两种方針。那一种方法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利？那一种方法更有利于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政策不能脫离实际，不能脫离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因而不僅要看革命的需要，而且要看革命發展的可能，必須是需與可能的統一。在这个需與可能統一的基礎上，我國对資本主义工商業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針，这个方針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實踐已經証明了是在我國条件下最正确的方針。然而，作为一个歷史过程，我們还有必要从下列三方面分析一下和平改造方針实现的客观条件，或者是这种方針是在怎样的具体条件下实现的。

(一)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我國过渡时期，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力量的对比条件，这是决定革命進程的客观基礎。我國过渡时期这种对比关系表明工人階級已經在下列主要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在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农民趋向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經濟的建立、發展和壯大；以及有利的國際环境等等。

第一、我國革命勝利後便實現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农聯盟為基礎，在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下，日趨鞏固，日益表現了它的不可動搖的巨大威力。工人階級領導了國家以後，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的地位，就起了根本的變化，強大的國家機器，成為工人階級實現社會主義任務和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政權問題是革命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便是造成工人階級優勢地位的决定性的條件。誠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指出的：“人民手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資產階級造反。”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便為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

我們國家建立以後，經過了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特別是抗美援朝運動的勝利，以及其他歷次政治運動、社會改革，乃至經濟建設的成就等等，都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偉大威力，向全體人民証明了人民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人民群眾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反之，資本主義的勢力則日益縮小和受到限制。所以隨着革命鬥爭的發展，工人階級的優勢地位是不斷地增長着。我們之所以說政權問題是一個决定性的條件，不僅在於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而且在於鞏固了這個政權。

第二、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還有了一個人數最多的階級——農民。而農民在基本的方面是勞動者，不剝削別人的勞動，這使他和工人階級接近。但農民又是小私有者和小商品生產者，這又使他同資產階級接近。所以当農民還是處在个体經濟狀況的時候，就必然要動搖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因此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力量的對比，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農民的趨向。從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就表現在對農民的爭取上。

然而我國的工农聯盟，是經過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深入農村，領導農民進行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我國農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革命戰爭，終於取得了偉大

的勝利，滿足了農民的根本上地要求。在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獲得經濟利益的農民占農業人口的70%，解放了的農民從地主手裡沒收過來獲得了七億畝土地。因此革命勝利後，進一步鞏固了工農聯盟，革命的領導者共產黨，在農民中享有無限的威信。這種工農之間長期的和親密的聯盟關係，不僅對於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以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對於把農民爭取到社會主義方面來，限制資本主義的影響預備了最有利的條件。

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基礎上，國家引導農民向合作化方面發展。國家先後通過在農村中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對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以及在農民中宣傳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便迅速推動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僅逐步限制了資本主義對農民的影響，逐步割斷了資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繫；而且由於農民趨向社會主義和拒絕資本主義，又反過來孤立了民族資產階級，推動着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過程，也就是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過程。這一過程在1955年下半年當廣大農村出現了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以後，就使“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也就是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一個根本變化。這一根本變化，又進一步孤立了資產階級和推動了資產階級的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的時候，便在剝奪官僚資產階級的基礎上，迅速組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經過1950年的穩定物價鬥爭的勝利以後，社會主義經濟便開始取得了領導的優勢地位，便開始具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下，經過短短的三年時間，就使我國的國民經濟恢復到抗日戰爭以前的水平，並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切向全體人民証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鼓舞了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因而也就

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經濟的領導。如果沒有社会主义經濟的迅速發展，沒有社会主义經濟領導的優勢地位，当然也就談不上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四、工人階級的優勢地位，还在于現階段有利的國際条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首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陣營。这使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事業，能够得到强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直接帮助和支持。其次，在各殖民地國家，普遍高漲着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經处在日暮途窮。在这种國際形势下，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轉到反对战争和爭取和平的洪流中來。这就使帝国主义者们的战争政策更加孤立了。

因此，我國社会主义革命所处的國際环境，同十月革命勝利后，苏联在1918年至1920年所处的环境，就有了根本的不同。这种有利的國際条件，使我國工人階級在实现社会主义任务和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它的有利地位。

十月革命勝利后，当苏維埃政权受到資產階級劇烈反抗的时候，列宁曾經这样說：“因为資產階級在这一方面不用直接搏斗的方法來考驗一下自己的力量，怎样能突然地服从这个嶄新的從來不曾有过的無產階級的政权呢？”<sup>1)</sup>今天我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首先，作为無產階級的政权來說，在我國革命勝利三十二年以前，就出現了苏联的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它对于我國就不是史無前例的了。其次，俄國資產階級曾經用过直接搏斗的方法來考驗过自己的力量，結果被碰得粉碎的不是無產階級政权，而是它自己。因而这种“考驗”也就成为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教訓了。

可以說，我國革命所处的这种有利的國際形势，不僅有利于我們的和平建設；而且也影响着資產階級去正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

1) 列宁：《論新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

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的時候，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就起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在政治經濟方面和國內國際方面，就取得了對於資產階級的絕對優勢地位。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這種優勢更日益增長。這一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控制整個局勢的發展，有可能利用一切發展中的可能性，爭取最好的條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二)其次，我們還需要考察，在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生長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性格，以及由此而帶來的階級關係的歷史特點，這是整個問題的核心。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態度，因此它是作為一個中間力量而存在。於是對於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階級來說，經過正確的政策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把這個中間力量爭取到革命一方，就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以說，這個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性所產生的革命問題，一直是我國革命中的關鍵性問題之一。

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無產階級曾經在資產階級發動下，同資產階級一道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封建主義。在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我國這種具體的歷史條件下，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因此工人階級爭取並領導了民族資產階級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但又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二重性，因此在另一種歷史條件下它又可能動搖變節。於是工人階級的政策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一階段革命中，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聯合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壯大革命勢力和孤立反革命勢力；批評其動搖性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堅定其跟工人階級走的態度。因而儘可能保持了這個統一戰綫，直到革命取得了勝利，把民族資產階級帶進了人民民主國家。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在新的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民族資產階級看到我們的國家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實現了國家的民

主獨立和自由，使國家日益走向強盛，因之他們擁護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但他們又具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的願望，因此當國家採取社會主義措施，使他們的剝削受到限制以及提出了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生存問題的時候，他們又表現懷疑、觀望和抗拒。資本主義工商業對於國民經濟來說，在一定時期還存在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着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性和破壞性的一面。資產階級中許多人既有愛國的表現，又希望這個國家幫助他們發財致富；既表示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又表現以五毒行為的猖狂進攻。歸根結底，對於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來說，既有接受改造的一面，又有抗拒改造的一面。

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並不是死的和凝固不變的，反之，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不同的表現。但這種轉化，不但要決定於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且還要決定於工人階級正確的政策。我們說民族資產階級二重性的特點是整個問題的核心，就在於這種轉化的可能性。這種轉化的可能性，就意味着和平改造的可能性，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國家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爭取他們中絕大多數人，轉變為積極接受改造的態度是可能的。如果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接受改造的可能性；當然就不能有和平改造。就正如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資產階級採取了“既不要任何過渡，也不要什麼新制度”的簡單的敵視態度，所以也就不能實現和平改造。但要把可能性變為現實，工人階級正確的政策，就有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我國這樣的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經過工人階級正確的政策，以及一系列巨大的工作，充分利用這一發展的可能性，就不僅可以避免因突然變革而引起的某些特殊破壞；而且可以化消極為積極，變阻力為助力。

我們之所以把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作為問題的核心，就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特點，不能不影響國家消滅剝削的途徑、方法和形式，不能不影響國家對待資產階級的政策。如果工人階級不利用這一發展的可能性，去爭取最有利的條件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就

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業，就要犯錯誤。因此針對这一特点，國家繼續採取了又團結又斗争，以斗争求團結，斗争为了團結，團結为了改造的二重政策，繼續把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內部。反之，工人階級的政策，又推动了資產階級的逐步接受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勵其接受改造的一面，批評其怀疑觀望的消極态度；在一定时期利用其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减少阻力和增加助力，以至順利地實現消滅階級和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問題的實質。

(三)由于我國政治經濟和歷史的特点，又为什么有必要对民族資產階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針呢？以及这种方針是在怎样的具体过程中實現的呢？

第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初期，我國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还存在着—幅錯綜复雜的圖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标志了我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勝利完成，但在实际过程中，还需要以兩年到三年的时间，來徹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首先，还要以一定的時間在軍事上肅清國民黨反动派的殘余势力；其次，在城市还要接管官僚資本的企業，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業，并在这个基礎上組織社会主义經濟；第三，在农村还要以兩三年的时间實現土地改革，滿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徹底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第四，需要立即着手整頓被長年战争所破坏的國民經濟，要整頓財政、平衡預算、穩定物價、恢复交通，为恢复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条件。这一切，都要求繼續联合民族資產階級，以利于徹底完成第一階段革命的任务；同时也要求利用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積極作用，同資產階級結成經濟上的联盟，以利于迅速恢复和發展國民經濟。

第二，当國內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我們面前还站着外部的敌人——帝國主义。特别是美帝國主义还在与國民黨反动派最后一批殘余勾結，公开侵占我國領土台灣。帝國主义者非常不願意中國人民實現了民主独立和自由，他們力圖使中國人

民恢复到原來的被奴役被統治的地位，力圖使反革命在中國復辟。美帝國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發動了侵朝戰爭，威脅我國的領土安全。帝國主義力圖制造挑撥離間，力圖在我國內部找到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以實現其破壞的陰謀。因此解放台灣的任务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而反对帝國主義的任务，則是更長期的和全民的任务。民族資產階級过去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勝利后也表現了愛國主義的一面，因此有必要繼續联合民族資產階級，組成堅強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和壯大自己。

第三，当國民經濟的恢复工作勝利完成后，國家开始在全國範圍內实行大規模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但由于我國原來的經濟落后、小商品生產占絕對优势，工業不發達，因此这种从旧的生產关系到新的生產关系的过渡，需要一个相当長的时间才能完成。于是在实际过程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問題：社会主义革命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又不利于突然变革；既要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又要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利用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既要消滅剝削階級，又要削弱其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因此也有必要繼續爭取資產階級，在一定条件下取得資產階級的合作，同它訂立某种協議。用說服教育的方式，爭取在資產階級自願接受改造的条件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从而使这种过渡，成为有秩序有步驟和沒有特殊破坏的轉变。

由此可見，無論从政治經濟和变革步驟的要求上，都表明了：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联盟，不僅对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必要的；不僅在政治上有必要，而且在經濟上和变革的步驟上也有必要。在这种必要和可能統一的基礎上，党对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針。

而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實質就在于：在一切經濟命脉操縱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許資本主義存在，預計到社会主义与資本主義之間的斗争，保證社会主义經濟成分的不断增



長和戰勝資本主義成分，消滅階級和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因此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的時候就確定了的。1949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上就預先指出：在過渡時期，我們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限制與反限制的鬥爭，而不是其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也指出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工作。”目前，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事業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全體人民的積極支持下，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從而也就是黨和國家的和平改造方針的勝利。

由於我國這種革命的和歷史的特點，在我們黨所領導的兩個階段的革命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歷來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第一階段革命中，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曾經幾度建立過統一戰綫關係，也破裂過統一戰綫關係。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上曾經出現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也出現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都曾經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害。然而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終於糾正了一切錯誤，堅持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正確路綫，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當我國革命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以後，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對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上，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新的條件下，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怎樣處理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經過怎樣的途徑、方法和形式實現消滅剝削和建設社會主義？這些，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來說，都是迫切而重大的問題。我們黨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過渡時期理論的啓示，根據蘇聯的革命經驗和我國的革命經驗，按照我國當前的具體環境和條件，找到了這一正確的途徑。

但是，在我國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沒有採取強力變革的方式，而是採取了和平改造的方式，那末，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之間，以及同一切修正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那里呢？對於向社會主義過渡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乃是以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首的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即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這種領導或者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有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至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當然只能以具體環境和條件為轉移。承認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由工人階級在它的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國家建立政治領導，這個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條件，就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者之間，以及同修正主義之間的原則區別。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權，並在這個政權的領導下，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不管變革的方式如何，都是社會革命的飛躍。我們採取和平改造的方式，不是為了保存資本主義，而是為了更有效地消滅資本主義。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對於從資本主義的舊關係向社會主義的新關係過渡來說，用那種突然的強力的方式來實現，並不是很有利的方法。特別是在經濟還不很發達的國家里，不能設想，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就可以立即廢除一切舊關係，並立刻就能把這種供應千百萬人的生產和分配的工作組織起來。因此如果能夠得到經過痛苦最少破壞最小的方式，逐步地實現從舊制度到新制度的轉變，難道不是更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更有利于工人階級嗎？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可以說，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方針的勝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就是堅持理論與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勝利，也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勝利。

## 2. 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內容

和平改造與對資產階級的剝奪，都是一種消滅剝削的鬥爭形式，但二者之間有其原則的區別。鬥爭的方式是和平的，發展的過

程是逐步的，因此它更需要長期的、復雜的、細致的和系統的改造工作，從經濟、政治方面的具體措施，以致思想意識上的教育和改造。因此在我國條件下，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作為和平改造的方針來說，包括了下列五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一、贖買政策；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三、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四、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五、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五個方面，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組成部分和主要內容。

第一、我國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了贖買政策。和平改造與無償剝奪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這種贖買。沒有工人階級的贖買政策，就沒有和平改造，因此贖買是整個和平改造政策中的核心問題。

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能不能向資本家實行贖買，這在理論上沒有什麼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許多著作中，都論證過這一點。恩格斯曾經說：“我們的黨一掌握了國家政權，它就應該干脆地剝奪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剝奪工業廠主一樣。這一剝奪是否要用贖買，這大半不是決定於我們，而是決定於我們取得政權時的具體情況，尤其是決定於大土地占有者先生們本身的行為。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允許的……。”<sup>1)</sup>接着恩格斯又轉述馬克思的意見說：假如我們能夠從剝削者手里贖取過來，這對於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

向資本家實行贖買，付出贖金，為什麼還說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呢？

革命總是要付出某種代價的，在這社會生產關係的大變革中，難道可以不付出任何代價嗎？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三十年的革命鬥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換來的。但是，當革命鬥爭的形勢，處在只能用這樣大的代價，沒有其他較便宜的道路的

---

1) 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33頁。

时候,当然革命者也不能有其他的办法。

革命的代價有兩種:一种是在大变革中引起特殊的破坏,从經濟的以至軍事上的破坏。像十月革命勝利后,經過了三年時間空前殘酷的內战,不僅在軍事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嚴重地破坏了社会生產力,以至苏維埃政权要花好几年的時間,來恢复原气和医治創伤。可以說,这种代價太大了,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沒有其他的办法。另一种就是实行贖買,就如同在我國条件下的贖買政策。这当然也是一种革命的代價,但这种代價比起前一种代價來,难道还不是最便宜不过的嗎?在前一种情况下所引起的破坏是不可以估計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階級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可以預計、可以計算和可以掌握的。顯然,兩者之間孰大孰小,是不可以比較的。

那末,如果取得政权的工人階級,能够控制整个局勢的發展,在不怕造反的条件下实行無償剝奪,是不是会更便宜一些呢?誠然,这样可以不付贖金,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实行無償剝奪,采取突然变革的方式,在經濟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某些特殊破坏,在政治上也要引起不利于革命的后果。这种損失也是难以預計的,它与贖金之間也是不可以比較的。如果能够用这种贖買,爭取資產階級接受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定时期提供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并在过渡的步驟上取得協議,对于工人階級來說,难道还不是最便宜的道路嗎?

所以說,革命总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这一种代價就是另一种代價。从贖買來看,所以說它是最便宜同时又是必不可免的,就在于下列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既然为了迅速恢复和發展國民經濟,在一定时期需要利用資本主义工商業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当然就要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允許資本主义存在。允許資本主义存在就要給以存在的条件,就要允許一定程度的剝削存在,讓它能够得到利潤。也就是說,要付出这种贖金。第二、我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驟是漸進的,因为这种漸進可以避免破坏,有

利于發展生產。因而对資本主义也必須是逐步利用、逐步限制和逐步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須取得資本家的自願和合作才能实现，因而也就需要一个逐步贖買和逐步付出贖金的过程。第三、資產階級中許多人具有管理企業的經驗、技術和才能，取得政权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立刻就培养出这样多的干部，不能立刻全部代替資本家在这方面的作用。我們不僅需要利用資本家在这方面的才能，而且还要向他們學習。如果需要从資產階級中取得这些，当然也不能不付出代價，不能不付出贖金。第四、我們要求把資產階級分子从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轉变为社会主义的積極因素，这是一个根本的轉变，需要一个相当長時間的过程。这里需要思想教育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贖買，没有这种物質关系，这种轉变就很困难。总之，对社会主义革命來說，我們付出一定的贖金，買來一个階級的自願接受改造，不僅削弱了資本主义的反抗，減少了破坏；而且从經濟上、政治上帶來積極的結果，难道这还不是最便宜的嗎？

列宁在1918年，即在國內战争尚未开始时，几次談到國家資本主义的时候，都談到了贖買的問題。列宁曾經把这种贖金叫作“为領教”而付的貢款。列宁認為：因为“为領教”而付款是值得的，是对于工人有利的，“而向國家資本主义偿付大批的貢款，这不僅不会傾覆我們，而且还会引導我們經過最可靠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sup>1)</sup>在同一篇著作中，列宁分析了当时政治經濟的特点时指出：“从这种特殊情况產生出來的，就必須作一种特殊的‘贖買’，工人們應該向文明的、最有天才的、最有組織者才干的、願意为苏維埃政权服务并誠心帮助整理大規模和最大規模的‘國營’生產的資本家貢獻‘贖金’，——这难道还不明顯嗎？”<sup>2)</sup>

贖買的方式可以有几种，在我國，按照我國的具体条件，不是一下子贖取過來，而是在十多年的時間內逐步贖買；不是由國家另

1) “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版六册，68頁。

2) 同上，76頁。

外拿出一筆錢來贖買，而是工人階級在為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生產的時候，從企業盈餘里面分配一部分給資本家作為贖買的代價。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的時候，我們就開始了贖買政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形式，目前採取了定息制度，並包括原來某些資本家的高額薪金。那末，是不是真真實實的贖買呢？工人階級為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真真實實地接受改造，那它所提出的贖買政策當然就不是假贖買，也不是半贖買半沒收。工人階級政策的偉大作用，就在於它是建立在需要和可能的基礎上的，是說到做到的。所謂真真實實就是要做到真正解決問題，調動積極因素，大家都能滿意。等到一定時期，自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贖買並非商品買賣，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利益，經過協商而提供的物質條件。

那末，是不是“太便宜了資本家”呢？當然，這對資本家是很便宜的，這種便宜同十月革命後俄國資產階級的道路是不可以比較的。然而，資本家之所以得到了這種便宜，是因為他們接受了工人階級的政策，接受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接受了工人階級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而且也接受了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對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提供了有益的貢獻。因此這就不光是便宜了資本家，而且更加便宜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資本家來說，得到了某種便利，以利于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追隨工人階級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却爭得了資產階級的接受改造，換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有利條件，難道不是更有利于國家、人民和工人階級嗎？這就是黨的贖買政策的偉大意義。所以說，贖買政策是消滅剝削的一種方式，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

第二、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就是意味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利用、限制和改造三者是統一的，但又是有所區別的。

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為了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為了消滅資本主義，那末，為什麼還要利用資本主義呢？消滅階級，不是出於單純的廢除階級的願望，必須是在已經達到的新的經濟條件下，才有

實現的可能。任何國家，哪怕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都能具備這樣高度發展的經濟條件，都不能沒有小商品生產的存在。這就提出了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為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服務的問題。而利用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提高社會生產力，以有利於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列寧說：“既然我們還無力實現由小生產者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資本主義——它是小生產與交換底自發產物——在某種範圍內便不可避免，所以我們也就應當把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與社會主義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來利用（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軌道上去）。”<sup>1)</sup>

我國原來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后的國家；首先是工業不發達，在舊中國現代工業的生產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很小，至1949年現代工業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其次小商品生產占絕對優勢，整個農業都是個體經濟，個體手工業生產在1949年也占工農業總產值的6.9%，還有很大數量的工場手工業；再次，由於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在廣大內地區的經濟發展比沿海地區更加落后。從這一基本情況出發，對於我國來說，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就更加具有經濟發展的客觀必要性。

因此，在我國條件下，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利用資本主義的意義就在於：第一，在一定時期利用其作為小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特別是借以加強與千百萬小農經濟的聯合；第二，利用其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借以提高產量、擴大商品流轉，利用其為國家積累資金（公積金和稅收），以及在一定時期保持勞動者就業；第三，利用資本家的生產技術，以及經營管理的經驗和才能等等。在一定時期發揮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就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有利於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創立社會主義的物質

---

1) 列寧：“論糧食稅” 人民出版社版，第33頁。

基礎。在这个意義上，利用資本主義就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為消滅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創造條件。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利潤，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於是資本主義的存在及其經濟活動，又使國民經濟的發展處於遭受破壞的危險。因此，在利用的同時，必須加以限制。有限制才能實現其為利用，沒有限制也就談不上利用，限制是為了利用，利用是為了發展生產。因此利用和限制都是積極的政策，都是從屬於發展生產的需要。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和限制是為了提高生產力，然而由於資本主義內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因此如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又必須逐步解放生產力。即創造條件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個意義上利用和限制又都是為了改造，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和徹底解放生產力，為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創造條件。

因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時期，還存在着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因此需要利用其積極作用。又因其存在着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因此需要限制其消極作用。還因為必須徹底解放生產力才能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因此必須改造和逐步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所以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三者之間，是辯證的統一，是最全面、完整和系統的政策。

工人階級政權下，在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上，可以有三種方式：第一是剝奪的方式，這一點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第二還有所謂“擠垮”的方法，即不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當作社會財富和社會生產力的一部分，而通過國營經濟的競爭和壟斷將其擠垮。顯然，這種辦法必然要導致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後果。我們在1954年的時候，在實際工作中曾經出現過類似的某些偏向，並引起某些消極後果。擠垮的做法，是不符合於國家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的，因此國家迅速糾正了這種偏向，並貫徹了統籌安排的方針。第三就是利



用、限制和改造的方式，這在我國是最全面、最完整的方針。

由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對立，因此有利用就必然有反利用，有限制就必然有反限制，有改造就必然有反改造，於是利用、限制和改造就成為我國條件下，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因此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鬥爭過程。不過，鬥爭是複雜的，但鬥爭的方式則是和平的。歸根結底，利用、限制和改造實際上就是消滅剝削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特殊途徑和方法。

第三、為了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就需要有一個相應的過渡的經濟形式。這種過渡的經濟形式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即首先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範圍，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步驟，逐步以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主義所有制，逐步以社會主義的新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的舊關係。

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從屬於國家，由誰組織的國家資本主義，就為誰服務；在工人階級國家和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當然就只能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在理論上是沒有疑義的。對於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來說，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門階，列寧曾經認為：“如果我們俄國有支配經濟制度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話，那麼，我們所處的情況就要和緩些，而我們解決社會主義的任務，也會接近些。”<sup>1)</sup>當然，在俄國當時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很大的發展。

在我國條件下，則有可能在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部門中，普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步驟，逐步完成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同時，也由於我國的特點，在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適合於我國情況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具體形式。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兩種相反的生產關係，但這種對

---

1) 列寧：“論新經濟政策”人民出版社版：第8頁。

立不是抽象的对立,它們共處在一个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中。由于在我國条件下,在一定時間內需要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并限制其消極作用,以及需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因此就有必要普遍實行這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如果在我們國家里沒有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為領導,就不能有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因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時期還存在着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并需要根據社會主義的利益對它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所以才產生了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所以在我國實現的國家資本主義,可以說是把發展社會主義和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統一起來了。而所謂逐步改造和逐步過渡,也就意味着國家資本主義。而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來實現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也就意味着和平改造。

因此在我國条件下,國家資本主義就成為階級鬥爭的主要場所,限制和反限制之間的鬥爭,也就主要表現在國家資本主義方面。所以說,國家資本主義也是一種特殊的階級鬥爭形式。

第四、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幫助他們正確地掌握自己的命運,逐步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即經過說服教育的方式,達到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這不僅是和平改造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我國消滅剝削階級的重要特點之一。

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的特點之一,就在於不僅要消滅資產階級,而且要改造資產階級分子。所以我們需要首先分析一下階級與階級分子的關係問題。

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必定有其階級中的分子:某種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必定有其各個個別的所有者;某種經濟關係中產生的某種立場和觀點,也必定要通過各個個別的具体的人表現出來。從這一方面來說,階級與階級分子是相互聯繫的。一切個別的資產階級分子,都受着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中所產生的客觀規律的制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們為自己的利潤而鬥爭,“並不是取決於個別

的資本家的意願，因為甚至他們最慈善的人也迫於競爭而不得不去響應自己的同僚：把勞動時間規定得和他們那里一樣的長。”<sup>1)</sup>資本代表了一種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但“當作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便是資本的靈魂。”<sup>2)</sup>

另一方面，作為資產階級中各個個別的分子的來說，則不是絕對穩定不變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也不能不是不斷地有新的分子參加進來，不斷地有原來的分子轉變為其他社會成分。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向下坡路的時候，剝削階級內部愈來愈出現分化的過程：有的人因為經濟上遭受破產，轉變為小資產階級以至無產階級；也有極個別的人可能從理論上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背叛原來的階級而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指出過這一點。因此從這一方面來說，一切個別的分子同他本階級的關係又各有其程度上的區別。在整個資產階級分子中間，不能不是有的人比較穩定，有的人比較游离。這種情形，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有大、中、小資本之別；而且表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開明和頑固之分。而這種情形又是在不同的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而有不同的表現。還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通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促進資產階級內部發生分化，並採取不同對待的方法發展進步、爭取中間和孤立落后。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一系列的說服教育工作，使他們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把改造企業與改造人的工作結合起來。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對於推動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沒有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和平改造就不能順利實現。

在這生產關係的大變革中，對於一切個別資產階級分子來說，不僅要經歷經濟上的轉變過程；而且要經歷思想上的轉變過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中文版，一卷445頁。

2) “資本論”一卷人民出版社版，203頁。

程。經濟轉變是思想轉變的前提，但思想上的轉變，也可以反過來推動經濟轉變的順利實現。所以說，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過程，就是消滅階級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同時實現的過程。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就是在改造企業的同時，幫助他們完成其思想上的轉變，也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在思想領域內的鬥爭，它也是一種特殊的階級鬥爭。

第五、對資產階級實行贖買政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等等，又集中表現為：在工人階級政權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农聯盟為基礎的，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盟。它不僅是政治上的聯盟，而且是經濟上的聯盟。沒有這種聯盟，當然也就沒有和平改造。

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盟，當然是階級的聯盟。但聯盟的實質問題在於：誰領導誰和誰跟誰走的問題。民族資產階級在這個聯盟內部是被領導的階級。這種聯盟的意義就在於：從對反革命階級和帝國主義的鬥爭來說，把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人民政權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和壯大自己；從消滅剝削來說，減少阻力和增加助力；對於建設社會主義來說，在一定時期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以及利用他們的技術經驗和才能，為經濟建設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了順利實現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執行工人階級的政策、方針和路綫。但在這個聯盟內部又存在着階級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兩條路綫的鬥爭。不過鬥爭的方式是和平的，鬥爭的尖銳程度不導向統一戰綫的破裂，鬥爭自始至終在這個聯盟內部進行，始終經過統一戰綫內部說服教育的鬥爭方式，達到消滅階級的目的。因此，這種聯盟實質上就是一個特別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條件下的一種特殊形式。

但與此同時，階級聯盟又畢竟是兩方面的：如果資產階級不接受國家的政策法令，不接受國家資本主義，當然就不能有這種聯盟；反之，如果工人階級在需要和可能結成這種聯盟的時候，不提

出相应的政策，也不能有这种联盟。因此二者之間又存在着协商关系，并且这种协商关系貫穿到一切具体政策和措施里面。既然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接受和执行工人階級的政策、方針和路綫，因而工人階級就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原則下，照顧到同盟者的利益，以至在协商过程中作某些讓步和妥协。

因此在我國条件下，不僅在經濟上对民族資產階級实行贖買政策，而且在政治上，資本家在我們國家里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至于違犯國家的法律，以及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破坏分子，当然又是一种情形。因此許多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参加了各級人民代表大会、中國人民政治协商會議以及國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國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業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还負責对資本家安排适当的工作。

那末，既然我國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既然資產階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又为什么还有民族資產階級参加政权呢？人們知道，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由于当时階級斗争的發展和要求，在苏維埃政权体系中是整个排除了資產階級和剝夺了資產階級的选举权的。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时，从沒有把限制資產階級的选举权問題，当作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問題提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寫成的“國家与革命”一書中，在分析到民主与專政問題时，也从沒有提到限制資產階級选举权这一点。到1918年11月，列宁在总结当时的情形时指出：“……剝夺資產階級的选举权，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的和必然的标志。在我國，布尔什維克党虽然在十月革命前很久，就已提出了这种專政的口号，可是他們並沒有預先說要剝夺剝削者的选举权。”<sup>1)</sup> 列宁同时又明白指出：“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特殊國家中的問題，而不是專政的一般問題。”<sup>2)</sup> 因此政权的性質，并不決定于是

1)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文選，莫斯科中文版二卷，467頁。

2) 同上，451頁。

否有資產階級參加政權，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則是由國家的領導者，國家的基礎，以及消滅剝削和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等等所決定的。而在我國條件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盟，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政權，是為了共同執行工人階級的政策、方針和路線，因而就更有利於國家的社會主義任務的實現。所以說，這種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條件下的一種特殊的形式。

黨的這種聯盟的政策，不是隨便一種政策，而是階級政策，是工人階級階級鬥爭的政策。要使這種聯盟導向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結果，就必須堅持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就必須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如果按照某些“左”的情緒辦事，用所謂“擠垮”的辦法來對待資本主義工商業；一切鬥爭，不講團結；以及要求對資本家實行剝奪等等，就不能使這種聯盟達到應有的結果。反之，如果按照某些右的傾向辦事，接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中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一切遷就，放棄原則，沒有批評，從而也不能使這種聯盟達到應有結果。可以說，和平改造方針的勝利，就是在實際過程中，不斷反對這種“左”的和右的傾向中取得的。

總的說來，上述五個方面，就是我國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內容和主要組成部分，它們之間都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這五個方面同時也反映了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具體特點。我們之所以說贖買政策是和平改造政策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如果沒有贖買政策，就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就不能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能爭取資產階級中絕大多數人接受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專政等等；而工人階級提供的贖買，也就是為了順利地實現上述一切，順利地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所以說，上述五個方面都是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內容，都是和平改造方針的不可分割的主要組成部分。

作為我國過渡時期基本的階級矛盾來說，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這種矛盾是在另一種特定的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存在和發展的，因而就產生了克服這個矛盾的特殊的道路。

在我國，克服這種矛盾的途徑，是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從上而下地領導；並取得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基本群眾從下而上的支持；同時也取得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自願接受改造，從而逐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會主義成分來實現的。就是說，這一從舊質到新質的飛躍，不是經過爆發的形式完成，而是經過非爆發的形式即和平過渡的形式來完成的。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看，爆發並不是飛躍的唯一形式，而只是飛躍的一種形式。這一點恩格斯很早就這樣指出說：“如果舊的東西充分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便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便暴力地代替。”<sup>1)</sup> 因此我們必須以具體的歷史觀點去分析社會發展中的飛躍，必須看出各個飛躍本身性質的差異和多样性。

從事物的運動、發展和變化的觀點來考察：矛盾的鬥爭是從始至終的，但鬥爭的形式則因不同的歷史條件和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產生着具體的特點；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但消滅剝削的途徑、方法和形式必須以具體環境為轉移；事物的發展由舊的質態進到新的質態必須經過飛躍，但飛躍的形式又必須以具體條件為轉移。相對的事物中有絕對，絕對的事物通過各個相對的事物來表現自己。因此，人們不僅要看到事物發展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而且要看出事物發展中的相對性和特殊性。在我國，消滅剝削和建國社會主義社會，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但這一過渡是經過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又因我國的具體條件產生着它自己的特點。

歸根結底，由於我國歷史的具體特點，產生着我國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特點，規定和制約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這個道路就是和平過渡。在我國條件下，這種和平過渡的特點就包括了：向資產階級實行贖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經過國

---

1)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版，第7頁。

家資本主義完成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以及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聯盟等等。可以說，它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特點。但“儘管我國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所干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sup>1)</sup> 這一切在實質上又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實現社會主義任務的形式。

### 3. 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與改造資本主義 工商業的決定性勝利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的方針，當然不是說，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以不經過鬥爭來實現；恰恰相反，和平改造本身就是一個嚴重複雜的鬥爭，它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不過，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和克服資本主義來說，是通過和平改造的方式來解決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工人階級的方向就是發展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資產階級則抱有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於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就展開了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但由於我國的特點，這種鬥爭主要表現為限制與反限制之間的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同資本主義的經濟，就在活動範圍、市場價格、稅收和加工訂貨的條件等方面，以及在工人的勞動條件方面，經常地、反復地進行着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初期，那時資本主義用囤積居奇、投機套購和高抬物價的辦法來顯示自己的力量，破壞國民經濟的正常生活，因此在 1950 年春天就開始了反對投機和穩定物價的鬥爭。經過這個鬥爭的勝利，使社會主義經濟開始取得對市場的領導地位，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力量的對比，開始發生

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版，第41頁。



了顯然的变化。

随着國民經濟的恢复与發展，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的对比关系虽然不断發生变化，但資本主义的絕對数額也有很大的增長。資本主义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还有很大的作用，資產階級还有很大的威風。反映在思想方面，还有所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說法，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对立起來。于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前進，資產階級变换了反限制的斗争形式。因而迫使工人階級發动了反对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报的“五反”斗争，以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从而階級力量的对比关系發生了重大变化：資本主义經濟的力量削弱了，資產階級在人民群眾中孤立了，資產階級內部也加深了新的分化过程；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經濟的領導地位确立，人民群眾的社会主义覺悟空前提高。

“五反”运动是比較激烈的群众斗争，然而仍然在于对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國家在“五反”定案和处理工作中，貫徹了“坦白从寬，抗拒从嚴”和“过去从寬，今后从嚴”的政策，給許多在不同程度上犯过五毒行为的人以改过自新之路，团結了絕大多数人，使極少数坚持不法行为的資產階級分子陷于完全的孤立。通过这个运动的結果，深刻地教育了資產階級，許多人开始走向進步，私營企業中的“五毒”行为从此有了不同程度的減少和減輕，于是为順利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針打下了决定性的基礎。因此对于國民經濟中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之間“誰战胜誰”的斗争來說，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勝利。所以說，“五反”运动是一坊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五反”运动以后，在新的階級力量的对比条件下，因而在斗争的方式上，就不需要像“五反”运动这样大規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主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資產階級在接受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現了：接受國家資本主义和留恋自由市場之間的矛盾；接受限制和反抗限制之間的矛盾；接受改造和抗拒改造之間的矛盾。这种情緒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話表达为：“挂紅旗，五星(心)

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于是就需要一个反复的和分別对待的教育和改造的过程：“他們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采取積極态度的，我們表示欢迎；采取怀疑态度的，我們進行教育并且表示等待；采取反抗态度的，我們進行必要的斗争，而且还是为了改造他們。”<sup>1)</sup>因而鼓励其接受改造的一面，批評其抗拒改造的一面，團結多数，削弱反抗，把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向前推進。

但是，資本主义工商業接受國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進展，同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同农業合作化运动的進展，同社会主义經濟的日益壯大和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積極性的高漲等等，都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說，資產階級中積極接受改造的人日益增多的这一發展趨勢，也是随着階級力量对比关系迅速变化的趨勢而發展的。在后一种趨勢下，使資本主义工商業如果不接受國家資本主义，就难以進行其生產和經營的活动。在这样大势所趨，难以抗拒的条件下，就導向了國家資本主义的迅速發展和“誰战胜誰”問題的順利解决。

在國家的和平改造方針下，能否用說服教育的方式，爭取資產階級中絕大多数人在經濟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轉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呢？在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出現高潮以前，或者在有些人中間还存在着疑問。

然而，用中國一句老話說，“事实勝于雄辯”。客观过程的向前推進，对这些疑問作了有力的答复。繼农村合作化高潮以后，在1956年元月，就出現了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全行業公私合营的高潮，就出現了資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不到十天的時間內，繼北京市而后，天津、西安、沈陽、南京、重慶、广州等大城市的資本主义工商業先后都全部实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营。至1956年3月底，全國新合营的工業企業共达七万多戶，它們共有职工一百零七万人，总產值六十六億元。三个月來新合营的工業占1955年底私营工業的比重：戶数达到77%，职工人数达到83%，总產值达到92%。

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18頁。

同期在省轄市以上城市新合營的商業共達28.7萬戶。也就是說，只有一部份小型的私營工商業在這個期間還沒有來得及轉變為公私合營。

絕大多數工商業者在這個高潮中表現了如下的特點：第一他們由個別申請公私合營，發展到集体的和按行業的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第二他們得到政府批准合營以後，掛燈結彩，游行慶祝；第三他們在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清產核資工作；第四他們得到人事安排以後，迅速在改進生產和經營管理上表現了積極的態度。努力爭取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為他們的中心口號。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中間已經沒有繼續徘徊觀望以至個別堅持反抗的人，然而從絕大多數看來，資本家接受改造的積極性，則是運動發展的主要方面。所以毛澤東同志於1956年1月25日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對於這種方法，過去在共產黨內和共產黨外，都有許多人表示懷疑。但是從去年夏季以來，由於農村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和最近幾個月以來城市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他們的疑問已經大體解決了。”<sup>1)</sup>

資本家能不能有接受改造的積極性，這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一般說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資本家同工人在生產中處於對立的地位，是剝削與被剝削之間的矛盾，這一切是沒有問題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才有“誰戰勝誰”的鬥爭。然而在我國條件下，由於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因而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一矛盾着的雙方，依據着怎樣的條件展開鬥爭，又如何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轉化。列寧說：“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面怎樣才能夠同一，是怎樣（怎樣成為）同一的——在什麼條件下他們是同一的、是相互轉化的，——為什麼人的頭腦不應該把這些對立

---

1) 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載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

而当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sup>1)</sup> 所以说，矛盾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才可能争取大多数人积极接受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出现了资本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当然，资本家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它只是说，在改变企业的生产关系上，基本上解决了，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解决。然而事物发展的进程总是带有二重性的，资本家敲锣打鼓接受改造的行动是社会主义的；但资产阶级本质并不因而就消失了，在高潮以后，还会通过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在新条件下的反复斗争仍然是存在的。

经过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高潮以后，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私营运输业都已经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了定息办法。于是：第一，凡属已经实行公私合营和实行了定息的企业，就意味着从原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在这些企业内部，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了。第二，因而也就在国民经济中消灭了纯粹的资本主义成分，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在这一方面两条路线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也不存在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基本上克服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已经转变为现实，党和国家的和平改造方针胜利了。

这个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七年來一系列巨大复杂的工作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整个过程来看，它已经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只是最后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基本上克服了阶级矛盾，但还没有彻底克服，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没有消失。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阶级

1)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86页。

矛盾已經退居次要地位，我們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內部矛盾了。

由此可見，我國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勝利證明了：第一，消滅階級必須經過階級鬥爭，沒有階級鬥爭以外的道路。過渡時期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誰戰勝誰”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沒有過去七年來一系列尖銳複雜的鬥爭，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鬥爭，就沒有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勝利。第二，鬥爭的方式則可以是和平的。“在我國的條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變個體的所有制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而且可以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為社會主義所有制。”<sup>1)</sup>這便是我們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

#### 4. 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與黨的又團結又鬥爭的政策

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帶有兩面性的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就是黨的又團結又鬥爭政策的基礎。但是，當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以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不是就消失了呢？是不是就由兩面性變成了一面性，只有積極性沒有消極性了呢？或者是不是可以說，當前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消極性的表現，僅僅是人民內部先進與落后之間矛盾的反映，而不是階級矛盾的反映呢？

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格，並不是偶然自生的，而是在中國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此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正確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及其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趨向和表現，從來就是我國革命中最重要問題之一。

前面已經提到，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格，因此引起了我國革命中階級關係的特點，從而也就規定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政策的特點，以至規定了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特點。毛澤東同志

---

1) 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載 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曾經不止一次地教導人們嚴重注意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格：“中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這種二重性，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黨的建設。”<sup>1)</sup> 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必須正確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格就在於：既要反對忽視資產階級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參加革命鬥爭的可能，因而忽視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又要反對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綱領、政策、思想、實踐等等看做一樣的東西，忽視它們之間的原則差別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二重性格，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階級力量對比條件下，表現為不同的趨向和特點。由於這種不同的趨向和特點，就規定了不同時期不同的團結和鬥爭的方式。它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各個發展階段上，也表現了不同的特點。

第一、在第一階段革命中，對於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言，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表現為：“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的發展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sup>2)</sup> 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態度，是由他們當時所處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但由於上述特點，就引起了這種階級關係的特點：由於民族資產階級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因此有可能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但又因為資產階級有動搖性的一面，它又曾經背叛過革命，破裂同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做反革命的尾巴。因此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經過了從統一戰線的建

1) “毛澤東選集”，二卷，575頁。

2) “毛澤東選集”，一卷，第4頁。

立到破裂然后再建立的过程。因此任务就在于要批評其动摇性，把它因結到革命方面來。但由于旧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質，因此民族資本始終沒有在國民經濟中取得統治地位，从而在第一階段革命中，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始終沒有上升为社会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所以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虽然經過了統一戰綫的破裂，但在另一种条件下，仍然能够把統一戰綫再建立，并尽可能加以保持住了。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內階級力量的对比和社会階級結構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反革命階級的被推翻和革命性質的轉變，民族資產階級与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因而上升为主要的和基本的階級矛盾。但这个时候，國家的領導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关系，是領導与被領導的关系，工人階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一般說來，在新的条件下，民族資產階級表現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兩面性，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表現了不同的特点。

首先，在國民經濟恢复时期，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表現为：在國家領導下，既参加了鎮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又在对敌斗争上表現一定程度上的动摇；既参加了國民經濟的恢复工作，又表現發展資本主义的强烈願望；既表示拥护共同綱領，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又表現以“五毒”行为猖狂進攻。現在可以回想，我們正确認識資產階級的这种兩面性，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由于資產階級具有發展資本主义的强烈願望，以及資本主义經濟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所以必須加以适当的限制。反之，如果看不到資本主义工商業在一定时期的積極作用，限制过多、过嚴、过死，也必然不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复和發展。当时如果看不見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不及时發動“五反”运动，不能設想將为革命帶來怎样的損害。反之，在“五反”运动中，如果看不見資產階級拥护共同綱領和接受工人階級領導的一面，如果看不見資產階級接受改造的可能性，以及尽可能保持統一戰綫的必要性，就要犯“左”的錯誤。这样也不能

設想，它將為革命帶來怎樣不利的後果。

其次，當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完成，國家開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在這個新的條件下，資產階級主要表現為接受改造與反抗改造的兩面性，既有接受改造的一面，又有反抗改造的一面。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如果看不見反抗改造的一面，因而不注意通過經濟的、行政的和思想教育的種種方式，逐步克服其反抗，逐漸增強其接受改造的一面，就不能有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反之，如果看不到接受改造的一面，以至要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加以擠垮或者剝奪，當然也不能順利地實現社會主義改造。

再次，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以後，客觀過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作為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克服了，但作為剝削階級還沒有消滅。作為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兩條路線的鬥爭，也解決了，作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接受改造和反抗改造的兩面性來說，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接受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可以說，除了極個別少數分子以外，主要已不是在經濟上反抗改造的問題了。在新的條件下，階級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已由於階級矛盾的基本克服而轉化為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中，還包含着小部分階級矛盾。新的條件出現以後，有人認為現在資產階級已沒有兩面性，只有一面性；沒有消極性，只有積極性，這是完全錯誤的。

條件雖然變了，但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並不因而就不存在了。既然資產階級還沒有消滅，作為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的某種表現，當然就仍然存在，因而它就要發為行動，起消極作用。但又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改變，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消極性又是正在逐步消失過程中。因此一般說來，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而言，在現階段仍然存在着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面性。

在新的條件下，資產階級中多數人正逐漸成為參加社會主義



建設事業的積極因素：他們中多數人積極工作，有許多人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競賽，貢獻出自己的能力、技術、經驗和才能；他們中許多人对改善公私共事关系采取積極态度；許多人努力學習，表現願意進一步接受改造，積極要求進一步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然而他們還有消極的一面：他們在企業的生產和經營上表現本位主義和片面觀點；有些人不關心國家和企業的積累，个别甚至挪用公款和盜用原材料；有的人在企業工作中不能自覺地守職負責，或者对公方代表采取冷眼旁觀的态度，个别甚至挑撥职工和公方代表的关系。他們中許多人還存在着嚴重的資產階級觀點，还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对待新事物，以至用資產階級觀點來看社會主義的新問題。

所以說，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对于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他們对于進一步接受改造也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面态度。但二者之間，積極的一面是主要的。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這一積極的和主要的一面，同時也不能忽視其消極的一面。這種消極的一面乃是作為一個剝削階級的实际存在的反映，是階級矛盾的反映，它与劳动人民内部先進与落后之間的矛盾有原則的區別。对于先進与落后的矛盾來說，在徹底消滅了階級以后也仍然存在，至于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及其消極性，則随着資產階級的徹底消滅就消失了。我們目前正視這種消極的一面，正是为了發展其積極的一面，克服消極的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改造的進一步順利实现。这对于当前改造工作的實踐上，特別对于广大工商業者的自我改造，都有極其重要的意义。

只承認一面性不承認兩面性好不好？这首先在于怎样才符合于客观实际，实际是怎样就應該怎样去認識它，符合于实际的認識才是正確的認識。只有正確的認識才能指導正确的行动，才不至于犯錯誤，走彎路，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如果只承認一面性，不承認兩面性，只承認積極性，不承認消極性，不是就沒有進一步改造的任务和前進的目标了嗎？反之，如果只承認消極性，不承認積

極性，或者是不承認積極性是主要的一面，這當然也不僅違反實際，而且同黨的方針對立起來，當然也只有導致人們去犯錯誤。因此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決不是主觀地要去加以某種描述，而是客觀實際的反映。

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一貫方針，就是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這種方針就是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而產生的。黨的這種方針就在於，逐步把他們領向進步方面，逐步改變其原有的兩面性，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從前一種兩面性的表現轉變為後一種兩面性的表現，實際上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走向進步的過程和趨向；反映了逐步擴大其積極性和縮小其消極性的過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乃是表現為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革命勝利後，當然就不存在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問題了，而是在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下的兩面性。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從前一種表現轉變為後一種表現，都意味着積極性擴大了，消極性被縮小了。因此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從前一個階段轉變為後一個階段，都反映其走向進步的過程，都反映了逐步擴大其積極性和縮小其消極性的過程，也就是反映了作為一個階級日益走向被消滅的過程。當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以後，則意味着民族資產階級的決定性的進步，當然也就意味着積極性更擴大了，消極性更縮小了。並在新的條件下；這種兩面性轉變為新的形態。因此雖然一般說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又團結又鬥爭，但在不同條件和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就需要有不同的鬥爭形式。而這一切又都是為了進一步團結他們，為了消滅階級和改造個人。當階級消滅了，個人改造了，當然所謂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由此可見，進一步的改造任務，也就是針對資產階級在新條件下的兩面性而提出的。而資產階級的消極性，也就表現了它的這種階級本質，因此最後克服其消極性，充分發揮其積極性，也就意

味着要最后消滅階級了。

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就一直是党的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的基础。只要民族資產階級还存在，党的政策就总是包括團結与斗爭兩方面的，就总是既有團結又有斗爭的。團結与斗爭；鼓励与批評，二者不可偏廢。在團結的时候不能忽略差別，就是說不能忽略还有批評的一面；在斗爭的时候不能忽略統一，就是說不能忽略團結的一面。同时無論團結或者斗爭，又都是为了改造。

可是，不承認資產階級还有兩面性的人，却進一步說：如果硬要說資產階級还有兩面性，則工人階級也應該有兩面性；因而說兩面性的人都是教条主义，彷彿說一面性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我認为这倒需要具体分析一下。可不可以說工人階級也有兩面性呢？我認为也是可以的。辯証法把一切事物都当作对立的統一来看，因此任何事物都可以說有兩面性，不过各有其不同的內容而已。不可否認，工人階級內部也有先進与落后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階級在階級斗爭中，也改造自己，工人階級也是处在一个不断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中。但我們所說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和內容：它是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以及非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之間等等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說，它是就这种特殊的階級关系而言的。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資產階級在这个关系中，既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資本主义的一面；所以說它有兩面性。反过来，工人階級在这个关系中，就只有社会主义的一面，只有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的一面。正因为工人階級在这个关系中，只有坚决的社会主义的一面性，所以才能有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可見那种說資產階級只有一面性的人，乃是想取消階級界綫，妨碍社会主义改造的徹底完成。因而說資產階級还有兩面性的人，到不一定是教条主义，反过来，說只有一面性的人，到是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学。

### 三、逐步改变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

#### 1.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畸形状况及其在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高潮以后，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转变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的國家资本主义，因而基本上改变了國民经济的原来面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國民经济中占了統治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原来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的國家资本主义，已经經歷了一个历史过程了。当我们要分析这个历史过程的时候，我們还需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个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某些畸形状况。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遭受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官僚资本的壟断，以及十多年来的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破坏。因而就使这种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先天不足的片面的发展。

第一、在抗战以前，帝国主义资本不仅控制了我国市场，而且直接控制了主要经济和交通事业。1936年帝国主义资本占旧中国经济的比重如下：电力 75.9%；煤 55.7%；生铁 80%；棉紗 32.6%；棉布（全能厂） 63.9%；捲烟 56.9%；铁路里程 90.7%；船舶噸位 69.5%。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壟断和压迫，当然大大限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加紧其对中国的侵略和統治。国民党反动政府于 1946 年先后与

美帝國主義簽訂的“鐵路借款協定”、“中美友好通商協定”，以及中美航空有關協定等等，這些條約都為美帝國主義進一步對我國經濟侵略開闢了道路。反動政府又頒布了符合美國資本利益的所謂“新公司法”，讓美國資本可以隨意在中國設立公司，並可以享受特權。在這種條件下，於是美國商品大量輸入，公開或者走私進口的美國商品，形成了美貨傾銷的狂飆，襲擊着我國市場。據當時海關統計：1946年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占我國進口貿易總額的57.1%；1947年占50.15%；1948年占48.42%，走私的數字則未計入。從外國輸入的主要是各種消費品，如罐頭食品、電器冰箱、尼龍絲織品、化妝品等等，不僅大量吸收了國家外匯，並使民族工商業受到了致命的摧殘。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以後，官僚資本通過接收敵偽物資大肆劫收，因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官僚資本控制了全國金融事業，壟斷了重要的工商企業：不僅包括鋼鐵電力水泥等重工業部門；而且包括了紡織等輕工業部門。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同官僚資本的銀行結合在一起，組成了強大的獨占和壟斷力量，並享有特權。至全中國大陸解放前夕，官僚資本占舊中國經濟的比重如下：銀行資本總額占59%；電力占67%；煤占33%；水泥占45%；棉紡設備占40%；棉織設備占60%；糖占90%等等。這種巨大的壟斷勢力，就成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障礙了。

第三、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多年來的通貨膨脹政策，又使原來就很脆弱的民族工商業遭受了劇烈的破壞。由於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果，物價直線上升，從每月每周每日的漲風，到幾個小時內都有漲風。於是原料價格比成品的價格漲的更快，迫使工業生產急劇下降，正當工商業陷於困境。

從事正當經營的工商業在美貨傾銷，通貨膨脹，以及人民購買力低和利率高的壓力下，停工停廠歇業和倒閉的現象普遍發生，生產經營空前萎縮，生產力受到破壞。在1946至1947年之間，由於美國捲煙進口傾銷，上海捲煙廠關歇了三分之二；天津15家煙廠

只有五家开工；广州大小烟厂 80 家多半垮台，失業工人达十分之八。由于美國所謂救濟面粉充斥市場，当时武漢大部分面粉厂停工減產；苏浙皖三省面粉業同業公会會員厂 43 家中倒閉了 20 多家。可以說，当时多数工業生產部門，几乎都处在無法維持的狀況。从事正当經營的商業，則出現了存貨減少，賬面盈餘的反常現象。上海的呢絨業由抗戰时期的四百多家，減为解放前夕的 180 家。广州各行業正当經營戶的虧損十居八九。可以說，民族工商業所遭受的破坏是很大的。

但是，当正当工商業处在內外夾攻走頭無路的时候，資本主义投机事業却应运而生。特別突出的是投机商業和金融業在这一时期有了畸形的發展。从 1937 年至 1948 年，上海的紗号增加了六倍；棉布号增加了十一倍多；糖行增加八倍；西葯房由 150 家增加到 700 多家。抗日戰爭结束后，全國銀行戶数逐年激增：1943 年底全國銀行总数为 570 多家；1947 年增为 720 多家；1948 年又增至 840 多家，并大量建立了分支行。至于銀号、錢庄，則更是如蟻赴羶地大量增加着。这样就助長了投机之風盛行，使許多工商業經營者，以競相投机倒把为出路；以对于價格的推波助瀾为得計；以巧取豪奪为經營的手段。这就是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前夕，資本主义工商業所处的境况。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通过对官僚資本的剝奪，國家控制了原來掌握在官僚資本手里的工礦、交通、金融、貿易等企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礎，为对殘破不堪的國民經濟实行改組、改造創造了前提。1949 年私营工業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 63.3%，私营商業占社会商品流轉總額的 87%。但資本主义工商業本身原來的那种畸形和不平衡的發展狀況，也为國家对它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在國民經濟中实行改組改造过程中帶來許多困难。

我國的資本主义工商業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長起來的，又是在这样曲折的道路上走过來的，这就帶來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片面的發展。据統計：1952 年全國私营工業 14 万 9 千多戶，这些企業

的职工达200多万人；1953年全国共有私营座商164万多户，从业人员360多万人，如包括座商行商摊贩合计，则达453万多户685万多人。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某些畸形的征象：

一、资本主义工业中主要是轻工业。1952年在整个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中，消费品生产部分占80%；同时是主要集中在纺织食品等工业部门。至于很小一部分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多数是为轻工业服务的修理和装配性的工厂。这种状况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先进与落后不平衡。资本主义工商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1952年全部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中，沿海地区占到83.8%，其中上海一市即占全部私营工业总产值的40%。资本主义商业也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在全部商业饮食业服务业资本家的投资总额中，上海市即占到37%左右。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长期以这些沿海城市作为他们的桥头堡，以及内地长期遭受着军阀混战，所以造成了这种畸形的发展。而广大内地地区的工商业，则处于十分不发达和十分落后的状况。这种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无论对于生产原料物料的供应和成品的运销上，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造成了不合理的浪费。因而也为以后的经济改组工作，造成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以及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形需要在很长的时期内加以调整。

三、存在着分散和落后状况。庞大数量的以及十分分散和落后的中小企业，占很大一部分。1953年全部私营工业的14万9千多户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业仅164户；职工在100人以上的企业仅2,048户；职工在10人以下和四人以上的小型企业达10万4千多户。1953年在全部私营工业的总产值中，属于工场手工业生产的部分则占到27%。手工业生产落后设备普遍存在。许多行业中，较现代化的设备与古老的生产工具并存。如在棉织业中，既有现代化的织布工厂；又有大量的“三娘教子”式的原始设备。在商业方面，至1955年全国私营商业达295万多户，从业人员390万

人；私营飲食業达 86 万多戶，从業人員 135 万多人；其中包括了大量家庭店。把这样众多的中小企業組織到社会主义經濟体系中來，就需要極其艰巨的經濟組織工作。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过程中，在一定时期利用其積極作用和限制其消極作用，以至經過國家資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將其納入社会主义經濟体系中的这种經濟改組和企業改造的过程，該是一个多么复雜和艰巨的任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改造工作就开始了。当时國家首先面臨了反动統治遺留下來的，由于惡性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災難的余波。但經過打击投机和穩定物價的斗争勝利以后，虛假購買力突然消失，因而使一向依靠帝國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資本，以及借通貨膨脹進行投机的某些行業頓時失去了依据；某些高級消費品工業、迷信品工業、过剩的銀行錢庄、过多的進出口公司等等，都在这一改組改造中遭受困难，以至受到了淘汰。其他部分工商業也因原料物料缺乏的影响面臨了困难。于是國家采取了調整工商業的重要措施：开始对私营工業实行加工訂貨和收購，幫助其克服困難；在商業方面調整地区差價和零售範圍；中央和各地陸續召开了專業會議，安排生產，解决產銷困難。随后又由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逐漸完成，农村購買力的提高，城鄉交流和國內市場的恢复和發展，于是正当經營的工商業，也就随着整个國民經濟的恢复和發展，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1952 年在五反运动中間，資本主义工商業所固有的作偽、詐騙、偷工減料、以次貨充好貨、短秤少碼、摻雜摻假等等惡劣行为，都被徹底揭露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行会把持、封建陋規，也像垃圾似地被清除了。因而使資本主义工商業在生產經營的方向上，开始了很大的改進，并導向有利于國計民生方面和國家資本主义方面的發展。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資本主义工商業經過經濟恢复时期的改組改造以后，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变化。

总的說來，在國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針下，資本主义工



商業在國民經濟恢复时期是有很大發展的：1952年私营工業的总產值为1949年的158%；1952年私营商業的零售总額为1950年的120.4%。顯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發展，这个發展是整个國民經濟的恢复和發展的組成部分之一。但是在这个發展中，在工業与商業之間，以及行業之間与地区之間，表現为不同的結果。

首先，私营工業在这三年中的時間內發展是很大的，1952年比1949年增長了58%。但是：第一，这种發展已經不是純資本主义的發展，而是开始導向了加工訂貨、包銷、收購的國家資本主义方面的發展。这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部分占全部私营工業总產值的比重三年來的变化如下：1949年占11.5%；1950年占27.3%；1951年占39.6%；1952年則占到49.6%。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这一發展的性質。第二，則是那些有益于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行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有的擴大了生產，有的增加了戶數：天津市1952年电工器材厂的戶數比1949年增加了將近六倍，同期机器鑄鉄厂戶數增加了45%左右；广州的化工厂到1951年比解放前將近增加了一倍。第三，由于原來盲目發展造成过剩的一些行業，則因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分別進行了調整或部分轉業和淘汰。至于某些制造高級消費品和迷信品的工業，也受到了淘汰。第四，由于沿海城市的工業在生產技術上比較先進，而內地城市的工業又比較接近原料基地和銷場，因而在不同行業和地区之間，造成了一些發展中的和不平衡的矛盾現象。

其次，商業方面虽然也有相當的發展，但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則比較大：第一，某些在一定时期有益于城鄉交流，有益于社会生產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行業，則有一定的發展：天津市南北土產業1949年只15戶，1952年增为78戶，同期教育用品業的戶數增加了60%左右，五金業戶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广州全市有关城鄉交流的五十一个行業中，在1950年和1951年中間实增了七千戶左右。第二，但商業發展的特点是零售上升，批發下降：1952年私营商業的零售总額比1950年增長了20.4%，但同期的批發总額則下降了

14.3%，即1952年为1950年的85.7%。这里也反映了这种發展的性質。第三，有些行業則被淘汰了：某些高級消費性和純粹投机性的行業，如舞坊、洋酒、金銀首飾、銀号、錢庄、股票証卷、房地產等等行業；某些不再适合于人民的需要或者失去經濟作用的行業。如报关、轉运、代理商、中間批發商、錫箔香烛迷信品等等行業。至1950年5月止，上海市紗商从解放前的586戶減为326戶，同期棉花行業从201戶減为79戶。天津市金銀首飾店在1949年有131戶，至1952年全部歇業轉業。广州市在1950年至1951年中，全部消除了封建鮮魚欄（中間商），全部棉紗商都轉業或歇業。至于某些在一定时期尚有需要，但由于过去盲目發展数量过剩的行業，則進行了一些新的改組和調整或維持在一定的水平。第四，由于交通恢复，經濟建設开展，农村購買力提高，某些內地城市的發展远远超过沿海的大城市：蘭州市解放前的私营商業只有2,700多戶，1951年則增为6,200多戶；鄭州市1952年私营座商銷售額比1950年增加了55.4%；同期上海只增加了6.3%。其他許多內地新兴城市的商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是，虽然資本主义工商業在國民經濟恢复时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都是逐年下降的。私营工業总產值占全部工業总產值的比重三年來变化如下：1949年占63.3%；1950年占51.8%；1951年占50.1%；1952年占39%。私营商業零售总額占全部零售总額的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50年占83.5%；1952年則只占57.8%。私营商業批發总額占全部批發总額的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50年占76.1%；1952年降为占36.3%。由此可以看出，國家是在保証社会主义經濟优先發展的条件下来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簡單地看到國家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过程，在國民經濟恢复时期是怎样具体實現的。首先，在当时条件下，如果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参加國民經濟的恢复工作，如果不利用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積極作用來發展生產

和繁榮經濟，將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呢？可以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那時社會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占少數，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民經濟中還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國家的正確方針下，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溝通城鄉內外物資交流上，在增加生產滿足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上，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國革命勝利後，國民經濟恢復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1952年全部工業生產總值達到了1949年的244.9%，達到了抗戰以前即1936年的122.3%。1952年農業及其副業總產值達到了1949年的167%左右，許多農作物產量超過了抗戰前的最高年產量。在這短短三年時間內，工業產值增加了將近一倍，農業產值增加了六成以上，顯然這種恢復和發展的速度是空前的。在這裡，如果不是人民政權的領導，如果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種發展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國家不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也不可能有這種空前速度的恢復和發展。同時實際生活也指明，國家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積極作用，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帶來積極的結果，從而就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造成了更有利的條件，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就是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是兩種相反的生產關係，但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卻存在着相反相成的關係。其次，是不是可以只有利用沒有限制呢？這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不打擊資本主義的投機性，不限制資本主義的盲目性，就不可能穩定物價和安定市場；就不可能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帶來積極的結果；就不可能為國家積累資金，着手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創造條件。我們國家在這短短的三年時間內，工農業生產有了這樣空前的恢復和發展，但並沒有產生過剩和危機的現象，如果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不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限制，那就是不可想像的。再次，由於這種利用和限制，就使將其導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必然的結果。因此至1952年，這種資本主義工商業，就已經不是原來狀況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而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開始向國家資本主

义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了。

总的說來，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和變化，是國家對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場上產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組改造的結果，也是對它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必要的準備過程。可以說，經過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就為對它進一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重要的基礎。

## 2. 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

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內容和組成部分之一。因為我國實行和平改造的方針，因此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意義就在於：經過這種過渡的經濟形式，逐步完成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逐步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關係，並逐步以社會主義的新關係來代替原來的舊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消滅剝削，以及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武器。

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初期，由於列寧的和平建設的計劃沒有實現，直到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時期，才開始施行局部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蘇聯存在的時間很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所出現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也很少。至1925年蘇聯國家資本主義租賃企業只有三萬五千工人，而當時蘇聯的工人總數有700多萬人。

在我國過渡時期，國家資本主義則成為階級鬥爭的主要場所。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分兩個步驟進行：第一步使資本主義工商業轉變為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並導向共由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的發展。這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制定的“共同綱領”中，就規定了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第二步則在各方面條件成熟的時候，把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實現社

会主义國有化。因此在我國，國家資本主义在工業、礦業、交通運輸業和商業等部門中，都得到廣泛的實現。

什么是國家資本主义經濟？在“共同綱領”第31條中又作了這樣的說明：“國家資本与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为國家資本主义性質的經濟。”也就是說，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國營經濟与私人資本主义經濟進行联系和合作的一種經濟，就是國家資本主义經濟。当國民經濟中既有社会主义經濟又有資本主义經濟的時候，一方面它們是兩種相反的生產关系，彼此有矛盾，不能和平共居；另一方面它們又都是國民經濟中的組成部分之一，因而在經濟生活中又不可分割地联系着。从而这种联系和合作就必须采取許多具体的形式，并使这种形式符合于國家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要求。这便是为什么說，國家資本主义就是階級斗争。我國國家資本主义的几种主要形式为：工業中有高級形式的公私合营，初級形式的加工、訂貨、包銷和收購等等；商業中除了高級形式的公私合营以外，还有初級形式的經銷、代銷<sup>1)</sup>。每一种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經濟同資本主义經濟之間，实行联系和合作的一種具体形式；同时也是實現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具体形式。

我們是实行逐步改造和逐步过渡的，因此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也是逐步推進的。这种逐步改造、逐步过渡的性質，也表現在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是从初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發展。即首先大量地、普遍地实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然后導向高級形式的發展。

一般說來，把整个資本主义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义的軌道，整个資本主义工商業都接受了公私合营的國家資本主义，这当然是由于整个政治、經濟和思想教育的种种因素，这些前面已經作了

---

1) 工業中的國家資本主义过去一般均劃分为初級、中級和高級三类形式，如收購为初級形式，加工、訂貨、包銷等为中級形式，公私合营则为高級形式。近來因在統計上难以劃分，國家統計局在統計数字上，也改为只劃分为初級和高級兩类形式，即除公私合营外，一律作为初級形式。

分析。現在單就國家資本主義的這些具體形式和發展階段，來分析這個具體過程的特點。

這裡，我們首先要研究加工、訂貨、包銷、收購，以及經銷、代銷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實現的，以及它們在實現利用、限制和改造方針上起了什麼作用。

我們是在國家操縱了整個經濟命脈的條件下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因此對於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來說，具有決定意義的有下列三件事情：第一是國家控制了整個金融機構。我們在接收了官僚資本的銀行以後，就組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銀行，隨後不久全部私人銀行也都實行了公私合營，就是說在較早的時期內解決了這個任務。第二是國家掌握了重工業，以及重工業方面的主要原料、燃料，如煤鋼鐵等等也都控制在國家手里，國家通過對外貿易的管理也控制了進口原料。第三特別有決定意義的是國家逐步加強了對於農產品原料和工業品原料的控制，隨着國家逐步擴大了對於工業原料的掌握，也就逐步發展了加工訂貨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1951年元月國家頒布了“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國家全部控制了棉紗的銷售，就給全部私營棉織業為國家加工創造了條件。同時國營和合作社商業逐步擴大對於農業原料的收購；也就逐步擴展了加工訂貨的範圍。至1953年11月，國家實行了對糧食統購統銷，隨後又對油料、棉花等技術經濟作物實行了統購，這樣就不僅把絕大部分私營工業推進到了這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使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開始有了大的發展。此外當然還包括了市場價格、稅收，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鬥爭。

國家通過收購包銷、加工、訂貨，以及統購、統銷等辦法，逐步加強了對於工業原料和銷售市場的控制，當國營經濟逐步擴大了對於原料和成品的控制以後，又加強了這種加工訂貨，以及經銷代銷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工業中的加工訂貨發展較早，在全部私營工業的總產值中，加工、訂貨、包銷、收購部分所占的比重歷年變化如下：1949年11.9%；1950年28.8%；1951

年 42.7%；1952 年 56%；1953 年 61%；1954 年 78.5%；1955 年 81.7%。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从 1951 年元月國家开始对棉紗实行統購以后，國家資本主义就开始有了重大的發展。至 1953 年下半年由于國家先后对粮食以及其他技術經濟作物实行統購以后，就使 1954 年有了决定性的發展，至 1955 年就把絕大部分的資本主义工業納入加工訂貨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了。

由于工業中加工訂貨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以及对粮食和农業原料的統購統銷，大大限制了資本主义的自由市場，因此又推动了商業中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所以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义發展得比較晚。在全社会批發总額中，國家資本主义及合作化商業（其中主要是國家資本主义）所占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50 年 0.1%；1952 年 0.5%；1953 年 0.5%；1954 年 0.5%；1955 年 0.8%。同期私营批發商所占的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50 年 76.1%；1952 年 36.3%；1953 年 30.3%；1954 年 10.2%；1955 年 4.4%。而在全社会零售总額中，國家資本主义及合作化商業（私营商業一部分經過合作化改造）所占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50 年 0.1%；1952 年 0.2%；1953 年 0.3%；1954 年 5.6%；1955 年 15.2%。同期私营商業由 1950 年占 83.5% 下降为 1955 年的 17.5%。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國家逐步擴大了原料和成品的銷售，因此私营批發商逐步削弱下去，國家資本主义在批發業中發展很少，至 1955 年只占批發总額的 0.8%。第二，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义主要在零售方面，主要是替國营經濟实行經銷、代銷，但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之間發展很小，直到 1954 年即國家实行了对粮食的統購統銷以后才有重大的發展，至 1955 年就上升到占全社会零售总額的 15.2%。

工業与商業，商品的生產过程和商品的流轉过程，都是社会生產中的統一过程，然而主要和决定的則是生產。因此在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中，由于資本主义工業大部分实行了加工訂貨等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由于國家控制了主要农產品的銷售，就使私营商業

难以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上取得貨源，就不能不轉而依靠國營經濟，接受經銷代銷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又因为國營商業控制了原料和成品的銷售，私營商業开始接受了經銷代銷，使私營工業在取得原料和推銷成品上，也就更加深了对國營經濟的依靠了。

那末，这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在实现对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上，又發揮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概括說來，首先大量地、普遍地实行这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導致了以下四方面的積極的結果：

第一、由于大量施行这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就使原來的資本主義經濟体系逐步發生解体。在加工訂貨等形式下，國營經濟不断擴大其对私營經濟的成品和原料的控制，就逐步切断了資本主義工業和資本主義商業的联系。从而就使資本主義工商業失去了原來的自由市場，不得不依靠社会主义國營經濟了。因此便从根本上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保證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其次，工繳貨價是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由公私双方協商決定的，資本家就不容易抬價居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主義的利潤。例如从1951年以來，私營企業的利潤一般是下降的趨勢。就是說，資本家对工人階級的剝削也因而受到限制。

第二、在这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条件下，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任务和生產規模，就不再是單純由企業盈利的大小來決定，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它由人民需要和國家計劃來決定了。就是說，它必須按國家的計劃來生產。在这种条件下，國家就有可能充分利用資本主義企業的生產能力，充分發揮資本主義的積極作用，并導向其有益于國計民生方面的發展。因此几年以來，在資本主義工業中，許多新建和擴建的企業，以及生產規模擴大了的行業和企業，都是适应了人民需要和國家的計劃而發展的。

第三、由于实行加工訂貨等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在这些企業的內部，使工人在生產中直接體現了國家的利益，并在逐步限制資本主義剝削的条件下，以及为了工人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事業的長



远利益和当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劳資关系,發揮了工人在生產中的積極性。实行了工人監督的作用,也保證了國家加工、訂貨任务的完成。

第四、首先大量推行这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为全部过渡到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准备了条件。对于这一点來說,有很大的意义。首先,國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是公私合营,但不可能一开始就普遍推行这种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因为,國家在开始时期需要把主要力量用在組織社会主义經濟,从事經濟建設,加强社会主义經濟的基礎;以及还需要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管理企業經驗的干部,还要積累經驗和准备一切其他条件。在这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条件下,企業的經營管理由資本家負責,工人实行監督,因而使國家有必要的時間來准备这一切。其次,不能一开始就大量推行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还在于必須要有一定的時間等待資本家的進步。他們开始普遍接受这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比較容易,他們在企業中还保有三权(所有权、經營管理权、人事权),还不触及到企業生產资料的所有权。經過这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作为过渡,使國家有必要的時間对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教育,也使資本家有必要的時間進行學習,充分比較和考慮,逐漸加强其接受國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決心。再次,为了教育資本家,也为了積累經驗,需要有必要的時間,对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作出一些活的榜样。因此國家在大量推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的同时,也对某些个別的企業实行了公私合营,并在这些企業中取得經驗,作出榜样,証明國家資本主义的高級形式較之初級形式的优越性。这一切准备成熟以后,把整个資本主义工商業过渡到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但是,虽然这种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在一定时期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帶來積極的結果。然而,这些企業的經營方式仍然是資本主义的,國家对这些企業只能实行間接計劃,不能实行直接計劃。因而在供銷之間、公私之間、地区之間、大企業

与小企業之間等等矛盾便在發展中日益暴露，这些矛盾實質上都反映了生產的社会性和資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这一切就成为提高劳动生產率和發展社会生產力的障碍。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益深入，在高级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方面，即在公私合营企業中間，則逐漸做出了榜样，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第一、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企業的生產資料就由私有变为公私共有，在企業內部改变了所有制关系；第二、國家就可以实行直接計劃；第三、在企業中就以社会主义成分为領導，經營管理就要采取社会主义方式，就不再以單純追求利潤为目的，而要逐漸向國营工業看齐了；第四、由于这种生產关系的变革，企業的公方代表就同企業內的工人結合，形成了領導的力量，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这一切就首先表现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產率，如1955年公私合营工業中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產率較同期私營工業中約高一倍。其次就是公私合营企業中生產穩定，質量提高，經營狀況也更好轉了。这种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便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开始有計劃有組織地把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納入公私合营，就成为客觀發展的大勢所造了。

前面已經提到，在前一階段对私營企業实行公私合营，主要在于做出榜样，取得經驗，因此在前一階段还没有开始有計劃的大量的發展。國家对私營工業实行公私合营，虽然从1950年以后就开始了，但至1950年底全國公私合营企業也只有294戶，而且大部分是接管的官僚資本和敌偽產業的股份。在整个經濟恢复时期，只对極少数的大企業特別是重工業企業实行了公私合营，1952年全國公私合营企業只增加到997戶，它的產值只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5%。到1954年，國家实行了对粮食和主要农產品的統購以后，不僅私營工業已經大部分而且私營商業也开始較大量地納入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了。因此，从1954年以后，國家就开始有計劃地对私營工業实行公私合营，高级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就

开始有了較大的發展。公私合营工業的戶数歷年变化如下：1949年193戶；1950年294戶；1951年706戶；1952年997戶；1953年1036戶；1954年1746戶；1955年3193戶。同期公私合营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歷年变化如下：1949年2%；1950年2.9%；1951年4%；1952年5%；1953年5.7%；1954年12.3%；1955年16.2%。而1955年私营工業的產值就只占16.2%了。

因此，在1954年和1955年兩年的時間內，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了重大的發展，这一时期实行公私合营的方式主要是对大企業采取个别合营，至1955年在公私合营企業中，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企業达336戶，而同期私营工業中則只剩36戶了。这一發展說明了資本主義工業中較大型的一部分，多数都已納入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了。因而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为繼續把整个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打下了决定性的基礎。

但是，由于私营工業中还剩下十多万中小戶，私营商業中則更加分散众多，因此，如果繼續采取个别合营的方式，就必然要在國家投資、配备干部、經濟改組等等問題上遇到嚴重的困难。因此在实际生活中便提出了改变工作方式，采取另一种按行業实行公私合营的办法。采取这种办法不但可以克服上述困难，而且可以对各企業的技術、劳动、設備、資金等等实行統一調配，合理使用；可以充分發揮以大帶小和以先進帶落后的作用；可以提高生產技術改善經營管理，進一步發揮現有企業的潛力。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起，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僅在工業方面而且在商業方面，就开始推行了按行業的公私合营。由于全行業公私合营办法的提出和推行，原來企業按四方面分配利潤的办法，就需要改变了，适应新的条件和要求，实际生活中又提出了在公私合营企業中实行定息的办法。由于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就不僅大大推進了改造工作的進度，而且引起了生產关系的重大改变。就不僅使改造資

本主义工商業工作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逐步代替資本主义所有制的進程中，躍進了決定性的一步。

于是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在1956年的元月就出現了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高潮。至1956年六月，原來私營工業中戶數的97.3%，职工人數的97.7%，產值的99.1%。都全部轉為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實行定息的國家資本主义了。私營商業也絕大部分經過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的國家資本主义，或者經過合作化的办法，全部實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了。就是說：整個資本主义工商業都被納入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了。

把整個資本主义工商業納入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就使原來國民經濟中多种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轉變為單一的公私合營和定息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这种國家資本主义就已經基本上改變了資本主义的所有制，資本家同他的生產資料的關係，僅僅表現在取得股息上。因而就基本上克服了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基本上克服了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所以說，这种國家資本主义經濟就已經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質的經濟了；資本主义工商業經過國家資本主义的過渡形式，逐步實現其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過渡，也基本上完成了。

因此可以說，由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的發展，即首先大量普遍地實行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然後全部導向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义，這就是我國過渡時期國家資本主义發展的基本特點。在這個發展中又表現了：由工業發展到商業；由主要行業擴展到次要行業；由對少數大企業實行個別合營到全行業合營；以及由四方面分配企業利潤的办法到實行定息等等特點。所有這些，都說明了這種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過渡，是逐步的過渡，是有計劃、有組織和有秩序的過渡，都反映了逐步過渡的要求。因此我們在這生產關係的大變革中，不但沒有引起某些特殊的破壞，而且每一步驟都帶來提高了生產的積極結果。列寧曾經指出，國家資本主义

就是社会主义的門階，我們的實踐經驗，完全証明了列宁的英明論斷。我們的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已經經過了這個“門階”進入社会主义了。

然而，我們在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並不是沒有遇到資本主義的各種反抗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接受國家的加工訂貨問題上，會因為種種不同的情形而有不同的態度：當他們還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取得原料和推銷成品的時候，他們並不很歡迎國家的加工訂貨，有的甚至表現拒絕或者抗拒；當原料受到限制，產品不易推銷的時候，則在不能不接受加工訂貨的條件下，有的人轉而採取加大成本、高報價、偷換原料等等手段，同國營經濟進行鬥爭；某些生產經營不正常，質量低、成本高、資金少難以維持的企業，則要求國家給予加工訂貨，幫助它解決困難。上述種種態度，在每一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有的今天企業困難，要求加工訂貨，明天情況好轉，就要求自產自銷。最初實行公私合營的一批企業中，有許多是在其困難到難以繼續維持的時候才實行公私合營的。在最初時期，資本家對企業實行公私合營還有很大的顧慮：當業務較好的時候，他們懷疑觀望、拖延等待以至公開抗拒；當進行公私合營工作的時候，則出現塗改賬目、轉移財產、抽逃資金和安插親信的鬥爭；在已經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有的也出現過拉攏和腐蝕職工、挑撥離間、打擊公方幹部，以及個別“合公營私”和破壞生產等等鬥爭。當然，其中很多人則表現了較好的態度。但一般說來，他們是在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和留戀自由市場的矛盾中走過來的。

由此可見，如果不經過穩定物價、“五反”運動、國家在過渡時期總任務的學習和宣傳等等教育，如果國家不逐漸加強對原料和成品的控制，以及工人監督、行政管理、市場領導等等一系列複雜的鬥爭，就不能有國家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可以說，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以及繼續把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納入高級形式的過程，就是一個複雜的鬥爭過程。把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的國家資本主義，就

是這一系列複雜鬥爭所導致的結果。所以說，國家資本主義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在我國則又是階級鬥爭的主要場所。

然而今天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國民經濟已經基本上消滅了純粹資本主義成分，資產階級中絕大多數人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都接受了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并被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帶進社會主義了。今天，階級鬥爭雖然還沒有消失，但今後更趨于緩和了。國家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國家的和平改造方針已經勝利了。

### 3. 消滅階級與個人改造，改造企業與改造人相結合

消滅階級與個人改造，改造企業與改造人相結合，即在逐步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同時，採取教育的方法，逐步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使他們由剝削者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這是我國和平改造方針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前面已經提到。消滅階級，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消滅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個人所有制。改造個人，就是要採取教育的方法，把資產階級分子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為什麼說，必須把對企業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結合進行呢？作為資本家，他們在這個變革中必須實現經濟的和思想的兩方面的轉變，把改造企業與改造人的工作結合進行就在於：使這種轉變能夠相互適應、相互配合和相互推移。如果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能夠適應這個經濟上的轉變而轉變，或者是主動地奔赴這個前程，就可以使社會主義任務順利實現。反之，如果他們的思想與這種經濟轉變不相適應，便要與社會發展的趨勢發生矛盾，便會產生抗拒思想，成為改造的阻力。

然而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他所處的經濟地位，因此這種矛盾和不相適應的現象，在許多人中間，是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甚至極少數人採取堅決的反抗態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改造企業的同時，對他們進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僅可以大大削弱這種反抗，而且有利於爭取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為社會主

义做積極有益的工作。从这一点說，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就具有主要的作用。

但是，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必須以对企業的改造为前提；思想上的轉变，必須以經濟上的轉变为前提。如果没有从限制資本主义剝削到消滅資本主义剝削的經濟改造，就不能实现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改造。資本主义企業在經濟上逐步接受國家資本主义的过程中，也就是逐步对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当企業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企業內部的生產关系起了变化，企業的經營目的也起了变化，不再簡單的为了追求利潤，而要从屬於人民的需要。于是就更有利于資本家去接受新思想和新观点，批判或拋棄旧思想和旧观点，就更有利于資本家去实现其思想上的轉变。就是說，思想上的轉变，是由于經濟轉变的迫切要求。

对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也是一种階級斗争，是階級斗争在思想領域內的表现。对企業的改造主要表现为經濟領域內的斗争，对人的改造主要表现为思想領域內的斗争，二者結合便表现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是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反映，經濟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斗争，三者之間，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和互相配合着的。思想斗争是整个階級斗争範圍內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在我國，教育和改造就是这种斗争的方式。

存在决定意識，意識是存在的反映。人們的思想是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而又为这个基礎服务，它是有階級性的。作为資本家，他們是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代表者，因此他們的思想，自然反映了資本主义唯利是圖的本質。馬克思說：“当作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灵魂，便是資本的灵魂。”<sup>1)</sup>唯利是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切观点和方法，就是資本主义思想的實質。这种思想，就是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反映，就是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的反映，而又为这种所有制服务。因此当这种剝削制度要逐漸被

---

1) ‘資本論’一卷，人民出版社版，203頁。

消滅，當這種所有制要逐步被改變，以及當資本家和他以前的財產關係要被改變的時候，不能設想，不在他們所有的人里面，引起激烈的思想上的反映。于是在這偉大的變革中，就必然要在所有的資產階級分子中，引起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

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我們曾經看到下述種種情形：資產階級中有不少先進人物在思想鬥爭中有進步，表現積極和帶頭接受改造，他們服從國家法令和工人監督，按計劃完成國家的生產任務；有很多人懷疑觀望，動蕩不安，“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也有人表現不好，抽逃資金、揮霍浪費、消極經營、悲觀失望；還有極個別的人堅決反抗，進行破壞。上述種種，都是經濟改造在資產階級分子中所引起的思想反映，都是激烈的思想鬥爭的表現。因此這種思想鬥爭，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思想同資本主義思想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誰戰勝誰”的鬥爭在思想領域內的表現。

如上所述，我們不难看出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就注意到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1949年10月以後，在廣大工商業者中間，進行了廣泛的關於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的宣傳教育。1950年國家關於穩定物價的鬥爭，不僅是經濟鬥爭，而且也是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鬥爭。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和抗美援朝運動中，對廣大工商業者都進行了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收到了重大的成效。1952年的“五反”運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五毒”行為進行了有力的打擊，使工商業者中間進步分子日益增多，為以後通過教育的方式進一步改造資產階級分子打下了決定性的基礎。1954年以來，國家對他們進行了過渡時期總任務的宣傳教育，並組織他們進行了政策、時事和政治理論的學習。這一切都收到了重大的成效，大大推動了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進展。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過程，既是改造企業的過程，也是改造人的過程。國家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就不但是經濟和政治鬥爭的結果，而且也是對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教育和改造的結果。



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就在于：向他們宣傳真理，說明社会發展的規律，指明他們的前途；使他們了解，社会主义是社会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使他們了解國家的政策，了解資產階級接受改造是唯一的出路；教育他們把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結合起來，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說，要經過宣傳教育的方式，來推動这个在資產階級分子中展开的思想斗争，經過这个思想斗争的勝利，爭取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改造。資產階級中接受改造的人越多，他們的思想轉變越快，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勝利。要經過这种思想教育的方式，逐步改变資產階級的二重态度，变消極态度为積極态度；發展進步、爭取中間和孤立落后；以至幫助他們在實現这一經濟轉變的同时，也順利實現其思想上的轉變，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作者。这便是为什么說，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也是一种階級斗争的形式。

前面已經提到，階級与階級分子是联系的但又是有所区别，不能把階級与階級分子簡單地等同起來。作为消滅一个剝削階級，乃是要消滅某种剝削制度，或者某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但是对于剝削階級中一切个别的人，或者一切个别的剝削分子，是不是可以像消滅旧的社会經濟制度那样去消滅他們呢？顯然，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对于剝削階級中絕大多数人來說，固然不能加以消滅，但他們的思想則要加以改造，即需要消滅他們的剝削思想，用新思想來克服旧思想，用社会主义思想來克服資本主义思想。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但要改造旧社会的經濟制度，而且要改造这些与旧經濟制度相联系的人們的思想。

毛澤东同志在“實踐論”一書中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关系。”<sup>1)</sup>而“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

---

1) “毛澤东选集”一卷 285 頁。

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需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sup>1)</sup> 這裡指出了，對於一切反抗改造的人們也需要對他們加以改造，不過，因為他們反對改造，所以就需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進入自覺的階段。革命勝利後，我們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但是對於一般的地主分子和官僚資本家，也同樣要去改造他們。不過因為他們是反革命階級，因此就需要經過強迫的階段，剝奪他們的生產資料，並在一定時期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

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來說，我們要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也要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但民族資產階級的情形不同：他們接受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他們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也不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用和平的方法，即對他們進行教育，並通過他們的自我改造來實現這一思想上的轉變。

那末，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都是剝削階級，為什麼對地主階級實行了剝奪，對民族資產階級却要贖買呢？當然，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都是剝削階級，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資產階級也是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者，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對象，但它們之間是有原則區別的。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來說，不能把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混為一談。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是舊的、腐朽的、反動的階級，但對於地主階級來說，則是先進的和革命的階級。我國過去兩千多年以來，地主階級一直是中國社會的統治者、壓迫者、剝削者和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者。地主階級代表了最落后、最反動的生產關係。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以後，地主階級同官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勢力相勾結，充當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基石，甘當帝國主義的走狗。因此地主階級歷來就是中國革命的對象，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從來都是革命的頑強的反抗者。因此革命勝利後，對他們的改造必須經過強迫的階段，但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仍然分給他們

---

1) “毛澤東選集”一卷285頁。

以土地，使他們在群众的監督下，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至于民族資產階級則跟地主階級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們在第一階段革命中是革命的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革命階段中，他們接受了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繼續同工人階級保持了联盟关系，参加了有益于社会主义的工作。因此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办法同消滅地主階級的办法，是大有区别的。那种把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混为一談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作为一个剝削階級总是要消滅的，作为一切个别的剝削分子來說，在一定条件下，他們个人的階級性是不是可以轉換的呢？我認为这是没有什么疑問的，个人的階級性是可以轉換的。我們通常所說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对抗，并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在一定的生產关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种对抗。馬克思指出：这里“所謂对抗，并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中生長起來的对抗。”<sup>1)</sup> 当我们消滅了產生这种階級矛盾的社会基礎，即消滅了剝削制度和消滅了階級以后，所謂階級矛盾当然就不再存在了。至于一切个别的資本家，只要他們接受了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接受了社会主义國有制，放棄了剝削，以劳动为生，他們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資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們同工人、农民的矛盾就消失了。这样，階級消滅了，个人的思想改变了，个人的階級性也就改变了。

但是，作为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比起对社会經濟制度的改造，当然更需要一个較为長期的改造过程。我們对于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首先在于爭取絕大多数人接受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接受改造的过程也是逐步提高的。刘少奇同志指出：“我們將讓資本家們有一个必要的時間在國家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下逐步接受改造。”<sup>2)</sup> 我們向資本家宣傳共產主义，宣傳放棄对工人的剝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中文版，一卷 341 頁。

2) 刘少奇：“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出版社版，55 頁。

削,并不是說立刻就要这样作,而是說要逐步做好思想准备,这种思想准备越充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越顺利。对于争取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接受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切,至于进一步去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需要更长的时期,但这将逐渐地只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了。

总之,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任务,这个任务的实现,与经济领域内和政治领域内的社会主义任务的实现,是密切关联着的。它要求根据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灵活的方式,进行巨大的教育工作。我国过去七年来的经验证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是收到了重大成效的: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提高了觉悟;那些怀疑观望的人正在走向进步;那些落后的人正在减少;那些极个别坚决反抗改造的人则日益陷于孤立。

于是,对于我国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进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则处于日益削弱、瓦解和消灭的过程中;而在这一过程实现的同时,也就是广大工商业者在国家的教育下,日益走向进步道路和个人与阶级日益分离的过程。或者说,就是资产阶级中接受改造的进步分子日益增多,中间分子日益转向进步,落后分子日益减少和孤立。以至进步分子由少数逐渐趋于多数,从而带动绝大多数人积极接受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就形成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趋于高潮的基础。所以说,所谓消灭阶级和改造个人,是通过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个人与阶级的分离来实现的。因此,消灭阶级与个人改造,改造企业与改造人相结合的方式,就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反映了这种逐步过渡与和平过渡的特色。

## 四、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新階段

### 1. “定息”對於改變生產關係的作用

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但今天的公私合營企業，已經不是原來由四方面分配企業盈利的公私合營企業，而是實行定息辦法的公私合營企業了。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已經開始改變了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但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定息辦法以後，則基本上改變了原來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係。因此定息辦法的實行，對於改變生產關係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來說，起了主要的作用。它標誌着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過程中的重大步驟，標誌了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新階段。

生產資料並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成為資本，只有當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並借以剝削僱傭工人的時候，生產資料才能成為資本。當生產資料成為資本以後，它就成為剝削工人的手段，“資本有一個唯一的生命衝動，那就是增殖價值，創造剩餘價值。”<sup>1)</sup> 剝削是資本家的利潤的來源，利潤就是資本的生命，這就產生了勞動同資本的對立和鬥爭。因此要解放勞動，就必須消滅資本，而所謂消滅資本就是消滅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實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所以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在於逐步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資本和解放勞動，以達到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目的。

但在我國條件下，不是採取無償剝奪的方式來消滅資本，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即用向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資產階級實

---

1) “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263頁。

行贖買的方法，來逐步實行這種所有制關係的變革。但這種贖買的方式，不是由國家另外拿一筆錢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贖買過來，而是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和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同時，從工人生產的企業利潤中，分配一部分給資本家作為贖買的代價。因此企業利潤分配的形式和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分額，就經常表現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協商關係，就經常表現了剝削與限制剝削之間的鬥爭。所以說它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着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日益深入，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等等，在私營和公私合營企業中，利潤分配的形式也有了相應的改變。這種改變的過程，反映了逐步贖買和由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到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程，到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定息辦法以後，就使這一過程躍進了決定性的一步。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為了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利于迅速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因此在當時的利潤分配形式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分額較大。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25條規定：凡屬公司組織企業中的盈餘，除繳納所得稅、彌補虧欠、提取公積金和股息外的餘額中間，資方所得分額一般應不少於60%；職工福利金和職工獎勵金一般應不少於15%，以及其他等等。這個時期，資方所得利潤占企業盈餘的比例雖然較大，但這樣做有利於刺激生產，繁榮經濟，從而也就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因此在當時是適當的。這種企業盈餘分配的方式，在性質上已經根本不同於資產階級政權下，資本家支配一切，一切以資本主義的利益為轉移的情況；而是表現了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要求，表現了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協商關係，以及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贖買。它是從屬於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利益和要求的。

但是，随着生產的發展和經營的擴大，于是在这种利潤分配的形式下，职工群众生產的積極性和提高劳动生產率的部分，結果都大部分擴大了資本家的利潤，因此就限制了劳动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逐漸增長了資本主义的消極作用的一面，并影响其走國家資本主义的道路。在“五反”运动以后，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發揮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積極作用，限制其消極作用，并逐漸引導他們向國家資本主义方面發展，于是國家改变了原來的企業盈余分配的形式，提出了按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职工福利獎金、資本家的股息紅利等四方面分配企業利潤的办法。其中資本家的股息紅利（包括資方代理人的酬勞金）約占企業利潤總額的25%左右。由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經過了恢复时期的發展，它們的生產和經營擴大了，因此資方所得利潤的比例虽然降低，但絕對數額并不減少，有的比以前还有增加。另一方面，企業公積金和职工福利獎金的分配比例，則有了相对的提高。因此这种办法对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來說，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公私和勞資之間的关系，有利于發展生產和促進國家資本主义的發展。

但这种四方面分配企業盈利的办法，随着生產和經營的日益發展，随着國家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日益深入，又越來越暴露其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第一、这种利潤分配的形式，还只局限于把所有公私合营企業仍然保持在單个独立的碎裂状态。所有公私合营企業中的公股部分都屬於國家所有，这一方面是統一的，但因为这些企業又都有私股，因此又使这些企業仍然处于單个独立的狀態。公私合营企業中的盈利，除了公股利潤上繳國家，私股利潤为資本家所得外，各个企業的公積金和其他經濟潛力，國家不能按計劃直接統籌調配，因而造成資金浪費，限制了經濟潛力的進一步發揮，以及產生其他盲目現象等等。第二、在对企業進行經濟改組、技術改造和管理上也受到局限，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理調整也發生困难。当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大部分企業还处于國家資本主义的初級形式，当公私合营企業还主要是为数不多的

大企業的時候，這種矛盾還不十分顯著。但是，當要將所有企業，不但大企業，而且中小企業也納入公私合營範圍的時候，當實行公私合營的企業不再是幾百戶幾千戶，而是幾萬幾十萬戶的時候，顯然，這種矛盾就更加突出了。第三、在這種企業盈餘分配的形式下，當公私合營企業經營管理的改善，工人羣眾勞動積極性不斷提高的時候，資本家從工人身上所取得的股息紅利就越多。這樣，它又同發揮工人羣眾的勞動積極性和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日益增長着矛盾。所有這些，都反映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所固有的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矛盾。

問題已經十分明顯，如要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就必須進一步觸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問題，就是說還需要解放生產力。但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是實行贖買政策的，因此就需要在堅持贖買政策的原則下解決這個任務。由於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國家便提出了按行業實行公私合營和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定息的辦法。所謂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依據息率，按季付給私股股東以股息，並一律規定息率為五厘。不難看出，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定息辦法以後，一方面國家的贖買政策仍然繼續；另一方面卻使這些企業的生產關係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基本上克服了上述各方面的矛盾，就為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了條件。

第一、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了定息辦法以後，就使企業的盈虧和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多少，脫離了聯繫。無論企業盈餘或虧損，盈利大或盈利小，資本家所得股息不變。因此在實質上就使資本家同他所有的生產資料，發生了分離，就基本上改變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這樣，就使職工羣眾在生產和經營中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直接對國家有利。雖然工人所創造的盈利的一部分仍然通過定息形式付給資本家，但息率和利潤數額是固定的，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不再擴大資本家所得利



潤的分額，而使生產力得到解放。所以定息辦法的推行，就基本上克服了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就是為什麼說推行定息辦法後，就引起了生產關係的重大改變。

第二、實行定息後的公私合營企業，在生產經營的管理上，就基本上與國營企業相同，從而在公私關係上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由於資本家所得的息率已經固定，國家在對公私合營企業的改組改造過程中，就可以打破經濟類型之間和企業之間的界限，按照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的原則，進行全面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經濟改組；就可以在技術、設備、勞動、資金等方面，實行合理調整；也可以在生產管理、財務制度和技術措施上，進行有步驟的改革和實行統一管理。總之，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為進一步實行經濟改組，發揮現有企業的經濟潛力，加強生產和經營的計劃性等等，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改變了生產關係的結果，反映了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客觀要求。

第三、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實行定息辦法以後，對於企業的進一步改造和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改造，也造成了更有利的客觀條件。付給資本家的股息是國家贖買政策的繼續，因此股息在本質上是剝削的。但資本家不能退股和變賣企業，他對資本的所有權表現在取得股息上，他取得股息的方式，同取得銀行存款的利息一樣。因此對企業內部的一切經濟管理，就可以有步驟地實行徹底改革。而這一改革又大大推動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思想改造。資本家唯利是圖的剝削思想，是生產資料資本家個人所有制的反映，而資本家的剝削所得，則是依靠他占有生產資料通過工人進行商品生產來實現的。實行定息辦法以後，就使資本家和他原來所占有的生產資料之間的關係發生分離，資本家在企業中的地位就開始發生了變化，資本家參加企業的工作就不再是以資本家的身份來管理企業，而是處於同普通企業工作人員一樣的地位。在這一新的條件下，就有利於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逐漸改變他們的私有觀念和剝

削思想，以及在經營管理上的資本主義經營作風和經營思想；另一方面，資本家也可以更好地學習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培養勞動習慣，並逐漸依靠勞動收入來代替剝削收入，把自己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即這種經濟上的轉變，為其進一步實現思想上的轉變造成了前提。

第四、用定息辦法來實現這一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還在於：不僅實現了解放生產力的要求，而且使資本家在這個變革中並不感到突然，因為他們還可以繼續得到股息，而且這種股息在一定時期內，是不受企業盈虧影響的可靠收入。資本家也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因此這種變革的方式，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在團結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共同為提高生產力而努力等等，都帶來巨大的積極結果。整個資本主義工商業接受了公私合營和定息，這說明資產階級中絕大多數人已經有了極其重大的進步，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方式，在滿足社會主義任務的要求下，適當照顧同盟者的物質利益，也不能有這樣順利的變革。

那末，定息什麼時候可以取消呢？作為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克服了。作為解放生產力的任務，也基本上實現了。因此取消定息的問題就還要看整個政治、經濟，以及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等等因素來決定，定息總是要取消的，問題在於什麼時候時機成熟，什麼時候取消定息對社會主義更有利。1956年12月，在工商業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上，國家已經宣布七年內定息五厘不變。

由此可見，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實行贖買政策的過程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採取了不同的企業利潤分配辦法，而每一種辦法都反映了不同時期國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要求，都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強的表現。而定息辦法的實行，則是在消滅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整個過程中，帶有質變意義的發展。實行定息辦法的公私合營企業，比起原來按四方面分配企業盈利的公私合營企業，也是一種質變。這

一發展，是過去六年多來，在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上獲得巨大成就的結果，是整個改造過程中的決定性的步驟。所以說，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實行定息，是基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具體標志。

## 2. 新條件下經濟改組的意義

經過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高潮，國民經濟中基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所有制，在這一新的條件下，就“必然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sup>1)</sup>。就是說，當資本主義企業中，生產的社會性和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以後，改造工作的主要方面，就轉到經濟組織工作方面來了。因此國家緊接在批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定息以後，就開始進行了艱巨和複雜的經濟改組工作。

建設社會主義既有改變舊制度的任務，也有創立新制度的建設任務，特別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任務。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創立和發展，國家就在國民經濟中進行了巨大的改組改造工作。國家在剝奪了官僚資本的企業以後，經過改組改造，把這些企業變成為新型的社會主義企業。國家創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施行計劃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制度，使社會主義經濟日益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過去六年多以來，在國民經濟中逐步改變了舊的經濟秩序，逐漸建立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秩序；廢除或者改造了許多舊的經營管理制度和勞動組織形式，創立了適合於一定發展水平的新制度和新的勞動組織形式；在工商業中淘汰或改造了許多不適合於人民需要的行業和企業，發展了許多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行業；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地區之間工商之間，公私之間和行業之間的經濟關係，使其適合於國民經濟發展

1)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解放社版，上冊，122頁。

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对國民經濟实行經濟改組改造的表現,都是屬於社会主义的經濟組織工作。

國家在过去对資本主义工商業实行个别公私合营的企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改組改造工作。几年來,由于國家資本主义初級形式的大量普遍發展,也对資本主义工商業進行了初步的經濟改組,資本主义工商業原來的生產和經營的規律已有了改变。

但是,当國民經濟中已經基本上改变了資本主义所有制,当整个資本主义工商業在一个运动的高潮中,实行了公私合营和定息以后,在这一新条件下的經濟改組,就具有另一种更为广泛深刻和重大的意义:

第一、在这一次运动高潮中实行公私合营的企業,几乎包括了全國所有城市的所有行業:从大企業到中小企業,特别是众多的中小企業;从工業到商業;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全國範圍內,几万以至几十万原來生產和經營的独立單位,在一个运动高潮中实行了公私合营和定息,实现了所有制的变革,不能設想,不会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發生一个重大的变化。于是,就提出了按照新的条件和需要,对这一部分工商業实行經濟改組的复雜而艰巨的任务。而这一部分工商業又是整个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之一,在經濟生活中同其他部分又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而这种經濟改組又必然广泛地关联到經濟生活中各个有关部分。它关联到國家的商業工作、稅收工作、原來对私营企業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建立新的企業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等等。条件变了,对象变了,方式就要改变,办法也要改变,旧的要退出,新的要上台。这便是为什么說,經濟改組工作是一个复雜和艰巨的任务。

第二、由于实行了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实行定息,在經濟改組工作中就可以打破經濟类型之間和企業之間的界綫。國家就可以在國营和公私合营企業之間,公私合营的企業之間,以及大与小、先進与落后之間,統一進行安排生產;進行技術設備、劳动資金等方面的通盤筹划和合理調整;進行管理系統、生產組織、財務管理等

方面的統一安排，以達到逐步消除國民經濟中的不合理和落後現象，發揮一切現有企業的潛力。就是說，由於這一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國民經濟中出現了新的經濟潛力，但這一切需要通過艱巨的經濟組織工作予以實現。

第三、由於生產關係的重大變革，在這一部分工商業中間，不僅在企業之間、工商之間和行業之間外部聯繫的形式需要逐漸作相應的改變，而且在這些企業的內部，在經營管理勞動組織工資福利制度等方面，也需要進行一系列的改造工作。在新的條件和要求的下，還需要在這一部分企業中逐步加強生產和經營的計劃性，由原來的無計劃逐漸改變為有計劃；由原來的間接計劃逐漸改變為直接計劃。

歸根結底，全行業公私合營後的經濟改組工作的意義就在於：由於國民經濟中基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所有制以後，發展中便提出了改變原來國民經濟中多成分狀況的經濟體系，逐步向單一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過渡。所以說，這種經濟改組工作，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一步深入；是消滅資本主義鬥爭的繼續；是從資本主義舊關係向社會主義新關係過渡的一個最深刻的過程。

然而，對於上述一切任務，能不能像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那樣採取群眾運動的方式和高潮的方式來實現？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經濟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必須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就是說，必須在有計劃、有步驟、有調查研究和充分準備的條件下，逐步實現。如果企圖好事一天辦完，大小一齊動手，從主觀願望出發，就必然要產生盲目現象，從而也就必然要為生產和經營帶來消極的後果。逐步過渡的必要性，對於經濟領域內的問題來說，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有些地區在這一方面的工作也曾經出現過某些偏差。從1956年元月以來，由於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廣大職工群眾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在生產和經營上出現了一片新

气象：在許多新合营的企業中迅速改進了生產和經營，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競賽，提高了劳动生產率，这些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特别是表现了由于生產关系的变革，为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創造了新的源泉。有許多地区和部門，由于事先進行了充分准备，实行了某些改組，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是，在某些地区和部門中，由于忽視了經濟改組工作的复雜性，緊接在批准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未經研究和规划就盲目地去改变原有的一切，因而也一度在生產和經營上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和損失。在工業中，有的盲目实行集中并厂，因而打乱了厂厂之間、工商之間、地区之間、工業与手工業之間等等的协作关系与供銷关系；有的把原來很分散的小企業不适当地集中，甚至把生產不同性質的產品的企業也進行并厂，使品种减少，質量下降和群众不滿。这些，不僅影响了人民的需要，而且为生產造成困难。在商業中，有的盲目撤点并店；有的过早地改变了原來的經營管理制度，或者过早地施行了暂时还不适当的新制度，結果使消費者感到不便，也使商店營業下降。所有这些盲目行动，都使职工群众的積極性受到損害，影响生產和經營的正常發展。因而國務院于1956年2月8日及时地頒布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項的决定”，指出必須在消除盲目充分准备、調查研究和全面规划的基礎上，進行有計劃有步驟的經濟改組。及时地和有力地糾正了这些偏差。把經濟改組工作納入了正軌。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產力和提高生產力，因此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实行經濟改組，归根結底，也就是为了進一步提高劳动生產率，發展生產和保證需要。但是社会經濟生活是由許多复雜的关系構成的，这些十分复雜的关系之間，是处在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約状态中的。而經濟改組工作所关联到的主要方面包括了：第一，在不同条件和要求下，实行生產和經營的改組；第二，逐漸改变經濟生活中各部門和各方面之間的旧关系；第三，逐步改变慣于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种習慣

力量 and 影响。总之，所謂經濟改組，就是在从旧关系向新关系过渡之間，在所有制变革以后的一切其他关系的变革，而在实现这些变革的同时，联系到对生產力方面的改組和改造。这样就說明了全部經濟改組工作的复雜性，說明了它不可能像变革所有制那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經過群众运动的高潮方式來完成。另一方面，經濟改組虽然是一項十分复雜的任务，但它所要达到的中心目的，則十分明顯地是要求進一步提高劳动生產率，發揮現有企業的經濟潛力，因此在經濟改組工作中每一具体措施和步驟，必須以是否有利于达到这一中心目的作为檢驗的标准。因此緊緊抓住提高生產和經營，是經濟改組工作中的中心環節。

至于在經濟改組工作中，大量实行并厂并店，是不是都会一律地为生產和經營帶來積極的效果呢？当然，在这次改造高潮中实行公私合营的企業，包括了众多的中小企業：这些企業分散、落后不平衡，技術差成本高浪費大，限制了潛力的進一步發揮，对于社会主义的生產和經營來說，造成了很多困难；因此在經濟改組工作中，有些行業需要按照大帶小先進帶落后的原則，适当進行并厂并店，达到提高生產和經營的目的。但是，这些企業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上，又有它們的特点和优点：适应市場需要的能力强，生產和經營有灵活性；广泛利用了家庭輔助劳动；与当地居民生活需要有密切联系等等。因此并厂并店問題，必須从以上兩方面來观察，必須把兩方面的需要結合起來。如果只凭一方面的需要來采取行动，就要犯片面性的錯誤，就要为經濟帶來消極的后果。

同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客觀的物質条件。在工業生產中，一般說來，大生產优于小生產，集中优于分散，但集中的优越性是以一定的条件，特別是以一定的物質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就是指整个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这些物質条件就是指技術、設備、厂房以及其他等等。这些条件的創造，以及國民經濟中的技術改造，是随着工業化事業的進展而逐步實現的。我們有容納几千工人的現代化設備的織布厂，但是如果我們今天要把“三娘教子”式的原

始織布設備集中起來，組成為幾千人的大工廠，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來混亂。過早地或不適當地集中并廠，就不但要失去原來的特點和優點，而且要造成新的困難，結果是影響了生產的正常發展。當然，如果客觀條件具備，而人們卻安於分散落后的現狀，消極保守，也同樣要妨礙潛力的發揮和造成了不利于生產的結果。至於商業中的并店問題，則必須以有利于為當地居民服務為前提。并店是為了改善經營管理，合理調整商業網，克服浪費和其他不合理現象，增加經營的花色品種，更好地為居民服務，離開了這一切而實行并店，就必然要造成營業下降，群眾不滿。一般說來，許多分散的供應人民日常必需品的小商小店，不宜於過早過分地集中。在原有基礎上適當調整，逐步提高，是最有效的方式。總之，由於經濟領域內從舊關係到新關係這一過渡的複雜性，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採取相應的方式，特別是必須善於採取靈活的過渡的形式和方法，逐步創造條件，逐步向更完善的組織和管理形式過渡。

我們國家在一切重大設施和具體措施上，都十分注意到這種在經濟領域內逐步改造和逐步過渡的必要性，並注意到及時檢查實際效果，糾正各種偏差；批判各種消極保守和盲目冒進的現象。因而保證了我國過渡時期國民經濟的直線上升和正常發展。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逐步的和平改造方針的重要要求之一，也就是為了避免因突然變革而引起的某些破壞。當我們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使我們能夠在充分準備的條件下，逐步去改變一切經濟領域內的舊關係的時候，又有什么必要去採取那種盲目的行動和粗糙的步驟，以至影響到生產和經營的正常發展呢？

在整個經濟改組工作中，我們還遇到大工業與小工業的關係這樣一個新的實際問題。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就意味着大工業，社會主義必須以大工業為基礎，然而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只需要集中的大工業，不需要分散的中小工業。大工業是國民經濟的骨幹，但小工業也是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小企業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



有其特殊的职能：如調節某些脫節現象；補充某些特別需要；滿足某一個別地區的特別要求；以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能進行機械化生產的某些行業等。今天，在我們的生活用品中，來自小工業和手工業就占很大比重。因此，在現有眾多的中小企業中，有的固然需要逐步淘汰，或者逐步改變為集中生產，然而可以肯定地說，也有相當一部分在很長時期內，需要保持其小量生產和分散生產的狀況。所以在今後很長時期內，我們不僅需要建設大工業，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且也要利用小工業。這一切都要求按照實際需要，分別放在適當的地位。特別在經濟改組工作中，以及對中小企業的經濟組織工作中，使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內部，在大小之間與集中和分散之間，有適當安排：使這些中小企業在生產和經營上，有靈活、機動和適應的余地；使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的發展，能夠利用它們的這種調節和補充的作用。國家已十分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

那末，這種經濟改組，既然是從資本主義舊關係向社會主義新關係過渡的一個最深刻的過程，於是在新舊過程之間，又如何實行其更替呢？新舊之間，既是彼此對立，而又互相聯繫，新過程既是对舊過程的否定，又是对舊過程中一切積極因素的保持。因此在這裡又提出了，在經濟改組工作中的否定什麼與保持什麼的問題。即在經濟改組工作中，怎樣對待資本主義制度中以及在我國歷史傳統中所創造的一切？

由於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原來的分散和落後現象，以及資本主義制度所遺留下來的許多舊的不合理的东西，妨礙着企業潛力的進一步發揮和生產經營的進一步提高，所以要實行經濟改組，要逐步去改變這一切。但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中也有許多好的積極的东西，需要我們從具體分析中尋找出來，加以利用和發揚，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根本否定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但這種否定決不是把資本主義制度中創造出來的一切，都一概簡單地加以拋棄；而是同時保持其一切積極的成果。對於社

会主义改造來說，不僅要根本消滅資本主义剝削制度，改变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为進一步發展生產开辟道路；而且是同时保持其全部生產力，并有批判地尽量吸收其中好的对人民有用的部分，改变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1918年4月，列宁曾經有过这样的提法，即为了提高劳动生產率，要求人們去研究和推行資本主义制度中創造的一种劳动組織方法“太罗利制”。列宁認為：“資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發明，即太罗利制——也和資本主义其他一切進步一样——包含着两种成分，一种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种是許多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來分析劳动中的体力动作，消除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等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sup>1)</sup> 列宁指出：在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一切有價值的成就。“社会主义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苏維埃政权和苏維埃管理組織与資本主义最新進步相結合这方面的成功來决定。”<sup>2)</sup> 在这里，列宁把“苏維埃政权和苏維埃管理組織与資本主义最新進步相結合这方面的成功”，当作社会主义實現的關鍵來看待，就因为“否定”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而这个規律是作为联系和發展的環節而起作用的。因此列宁对“太罗利制”的提法，正是这种否定与保持之統一的觀察，这一点对于我們当前的經濟改組工作，以及对于整个國民經濟中的改組改造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我國广大工商業中間，像这样需要保持利用和發揚的东西不是也很多么？首先，有許多屬於劳动人民多年來經驗的積累所創造的某些特殊產品和特殊技術，需要特別注意保持發揚和提高。即使像“張小泉”的剪子，“王麻子”的刀子等等，也都是与当地人民的生活需要有密切联系的。有許多質量規格特殊的產品，多年來受到消費者的欢迎和爱好。在許多城市，都能找到多种多样为群

1) “列宁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下册，389頁。

2) 同上。

众所喜爱的有特色的產品。其次，有許多工厂和商店在生產和經營上，品种全，花色多，变化快，服务好，这就要求我們去研究，保持和利用其積極有益的經驗。第三，在許多行業中，企業与企業之間，原有的很科学很合理的协作关系，也需要我們去研究和利用。第四，原來的許多私营企業中，在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上，也有許多積極的合理的部分或因素，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要求深入調查研究，進行具体分析，有的應該加以保留、利用、提高和發揚，有的應該利用其積極部分改变其消極部分，有的需要改变其內容、利用其形式。如果我們在这一方面不采取慎重的态度，簡單地廢除一切旧东西，就必然会造成不利于生產經營，以及不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結果。

根据我們过去几年來社会主义改造的經驗証明：在改造工作中凡屬采取正确的态度，慎重地对待旧制度中的一切其他方面，就能迅速推动工作，取得成績，并受到人民的贊揚；凡屬盲目地打乱和拋棄了原有一切，就要脫离群众，為生產和經營帶來不利的結果。过去几年來，有的地区和部門在改造工作中，对于这一方面曾經發生过某些粗糙和疏忽現象。國家已經十分注意到糾正这方面的某些偏差，在許多地区和部門，已經恢复并且改進了許多一向为人民所爱好的某些特殊產品，以及其他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資本主义制度表现为更高級的过程，不僅因为由于对旧的經濟制度的否定，剷除了一切妨碍社会發展的桎梏，为進一步發展社会生產力开辟了道路；而且也因为它繼承了旧制度中一切發展的成果，一切科学和積極的因素。假如把旧制度中發展的成果和科学的因素，也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貼上旧階級的标签，像消滅階級一样加以拋棄，那就真要像斯大林所說的“穴居野人”了。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片面、弯路、錯誤和破坏，就不但要善于去保持旧过程中一切積極的成果；而且还需要吸收資本主义世界中一切科学上的最新成就。

总之，对于建設社会主义來說，这里用得着列宁曾經摘引的关

于黑格尔的一句話，即使“它不僅沒有因其辯証的前進運動而喪失了什麼，丟下了什麼，而且還帶着一切收穫物，使自己的內部不斷豐富和充實起來”<sup>1)</sup>。

因此，在經濟改組工作中，不僅要注意逐漸過渡的步驟，而且還要注意否定與保持的問題。經濟改組工作是當前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工作中的重要任務。隨着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工作的繼續勝利推進，就不僅要最終地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而且將要逐步改變國民經濟中原來的落後狀況，造成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經營水平。而創造大大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表現，就是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的統一，也就是當前經濟改組工作的中心目標。

所以說，在新的條件下，任務的主要方面就轉到經濟組織工作方面來了。私營企業一經公私合營以後，主要問題就在於經濟方面的組織與管理，管得好才能表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在經濟組織工作方面的任務不僅將越來越大，而且日益要求細緻和深入，生活正不斷向人們提出新的問題。從1956年一月以來，我們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取得許多有益的教訓，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作為今後改進工作的南針。這一切還需要我們深入地進行科學研究。

### 3. 關於公私共事關係問題

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取改造企業與改造人相結合的方式，因此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也就是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基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高潮以後，國家對廣大工商業者在企業中都安排了適當的工作。但由於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和定息辦法，即由於這一生產關係的基本改變，資本家在企業中的地

1)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版，220頁。

位,就开始發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改造人來說,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于这一根本的变化,就开始提出了企業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問題。

第一,資本家原來在企業中的三权發生了变化,其中資本家原來在企業中行使的財產所有权,轉变为定息的形式和僅僅表现为取得股息問題上。至于資本家原來在企業中行使的人事調配权和經營管理权,則已經由國家完全代替了。在新的条件下,資本家已經由企業主的地位轉变为公私合营企業和部分國营企業的工作人員,他們在企業中的职权是由國家委派的。顯然,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第二,由于这一根本变化,企業內部原來的勞資对立关系,就轉变为階級的和共同工作的二重关系了。就是說,企業中原來勞資对立的關係,就由新的公私共事关系所代替了。作为共同工作关系,表现在在新的条件下資本家同职工群众之間,在企業工作中的目的和内容是一致的。資本家在企業工作中所負的職責是貫徹社会主义的經營管理制度,他們的工作已經基本上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務了。作为階級关系,則表现在資產階級的消極作用,資本主义的經營管理方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以及剝削还没有徹底消滅等等。因此在公私共事关系中間,仍然是有团結有批評,仍然是从团結出發,經過批評达到更好的团結。

第三,由于上述根本变化,对于个别的資產階級分子來說,許多人就开始由社会主义的对立面逐步轉变为参加社会主义事業的積極因素。資產階級中大多数人,他們都具有一定的經營管理經驗和科学技術知識,他們还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較高的文化水平。經過几年來的教育和改造以后,他們中多數人就已經成为我們國家的積極因素。在新的条件下,更有利于進一步利用他們的經驗技術,發揮他們的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務。因此再經過必要的教育和改造以后,他們就可以成为参加社会主义事業的重要的積極因素。这一方面同时也是企業中同資方人員發展共同工作

关系的政治基础和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所谓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就是在新的条件下以公私合营企业为基地，继续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而继续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和搞好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实质，则在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为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所以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提出，说明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要经过这个阶段，实现其由二重关系向单一的合作互助的共同工作关系的转变。这个转变的逐步实现，不仅意味着彻底消灭阶级，而且意味着增加了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阶级的和共同工作的二重关系之间，在目前共同工作的关系则是主要的。

这种公私共事关系，在每一个公私合营企业的内部，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的公方代表；第二是私方人员；第三是职工群众。对大多数公私合营企业而言，都是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高潮以后，才开始建立这种公私共事关系，因此在这些关系中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从公方代表与私方人员的关系来看：有许多企业在这方面的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公私双方人员都能协商办事，互相帮助，分工适当，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公方代表对资方人员的优点缺点成绩错误，是非分明，有鼓励也有批评；而资方人员也能守职尽责，帮助公方代表搞好业务。然而也有很多企业在这方面的关系是不够正常的，曾经有所谓“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的三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作上虽有分工和协商，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的帮助不够，应该批评的不加批评，表现迁就；或者是尊重私方人员职权不够，使协商流于形式。而私方人员也表现不够积极，怀有顾虑，或者瞧不起公方代表，不积极帮助公方代表熟悉企业情况和业务。在少数企业中，也有关系搞得很不好的，或者是公方代表在工作上一把抓，独断独行，对私方人员只有

批評，沒有鼓勵，使資方人員情緒消極；或者是私方人員作風惡劣，輕視公方代表，欺壓職工群眾，在工作中不守職盡責等等。但是經過一年來黨和國家的教育，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的改善，那些關係搞得較好的更有改進；關係不正常的日趨改善；關係搞得不好的已經日漸減少。總之，日益向好的方面發展。

其次，就是私方人員同職工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這方面的關係，由於在私營企業中原來的勞資關係突然轉變為公私共事關係，於是這個轉變中還存在着一些問題，還需要一定的過程，這是可以理解的。目前要改善這方面的關係就需要進行三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吸收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的民主管理，貫徹群眾路線，依靠職工群眾办好企業和搞好生產；第二還要在廣大職工群眾中間廣泛地宣傳黨和國家的贖買政策，使每一個職工群眾都能具體深入地理解贖買政策的偉大意義，使黨的政策變為群眾行動的指南，也就是說，要依靠群眾貫徹黨的政策。第三也需要對私方人員進行教育，幫助他們建立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特別是在工作中守職盡責，做出成績，用實際行動逐步改變職工群眾對他們的看法，逐步消除過去的隔閡。所以說，上述兩方面的關係中間，在目前私方人員同職工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主要的。

但搞好公私共事關係的關鍵問題在於：必須把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和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辯證地結合起來。作為資本家，當他們的這些技術經驗和才能受資本主義思想束縛的時候，就影響其在生產和經營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反之，如果經過思想改造，逐步擺脫資本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可以進一步發揮其有利於生產和經營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能力，幫助他們在生產和經營上做出成績，就可以進一步堅定他們改造的信心，進一步促進他們努力去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因此通過利用和發揮他們的技術、經驗和才能，就不僅直接有利於生產和經營的提高，而且可以使他們在實踐過程中批判資

本主义的旧思想，接受社会主义的新观点，培养劳动习惯，认识劳动光荣和剥削可耻。

自从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和经过人事安排以后，在广大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私方人员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有不少人在竞赛中成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正是把对他们的改造和发挥他们的才能相结合的表现：他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不仅贡献了原来的技术和经验，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学得新的本领，为生产和经营带来积极的成果；他们在竞赛中同时又受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认识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

但是为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改造他们的思想，还必须与他们共同工作的公方人员同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接触，经常对他们进行具体帮助。对他们的错误和落后思想要批评，对于进步和成绩则要鼓励，必须把批评与鼓励结合起来。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没有鼓励就会使他们缺乏信心。同时，批评要指出改正的方向，使他们能够认清自己进步的方向和目标。但无论批评或鼓励，都在于发扬社会主义思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因此批评或者鼓励都是一种斗争的方式。

或者还有人对于同资方人员接近有顾虑，怕同资本家过多接触，就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危险。其实是否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在于接触不接触，而在于自己是否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为实现党的政策进行积极的工作。难道我们不去同资本家进行普遍的接触，保持“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的状况，就能避免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危险吗？难道不认真从各方面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不在工作中通过各个具体环节去影响他们，不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就能算站稳立场吗？

“左”是不是比右好一些？当然，右是不好的，它表现在放弃原则，丧失立场，过多迁就，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以至受资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腐化墮落等等。这当然不利于社会主义，也不利于对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然而“左”也并不好，它表現在只有批評，不敢鼓勵，一切斗争沒有團結；使私方人員情緒消極，工作困難，以至影响到企業的生產和經營，实际上違背了党的又團結又斗争的政策，这样不利于生產和經營，当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因此無論“左”和右的傾向，在實質上都是一樣的东西。兩種錯誤傾向，都違背社会主义利益，都为社会主义帶來不利的后果，都要坚决加以反对。我們必須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針和貫徹党的政策。在公私合营企業內部，資方人員有兩重身分，一方面是國家的公職人員，另一方面又是資本家，因此在共事关系中也就有了階級关系。从而就需要正确地掌握这种兩重关系，貫徹有團結有斗争，以斗争求團結的方針。貫徹这一方針就主要在于通过工作中有鼓勵有批評表現出來，通过这种鼓勵和批評以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克服他們的消極性，最后也还是为進一步團結他們。

在公私共事关系中間，我們还需要提倡相互學習。这不僅在于私方人員應該向公方代表學習，學習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集体主义的精神，國家的整体的觀念，以及走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等等。而且公方人員和职工也应向私方人員虛心學習。由于社会發展的歷史条件，在技術和業務方面，有許多需要向私方人員學習的地方。作为資本家，他一方面是剝削者，另一方面又曾經是企業生產和經營的組織者，因此資本家还有其歷史的作用，他們的一切有用的技術經驗等等，也是一种社会遺產。列宁在1918年还这样說过：“配称为共產主義者的，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底組織者學習即不能創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們。”<sup>1)</sup>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由已經夺得政权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去熟悉和采用旧制度中所达到的一切成果。列宁当时指出：俄國优秀的工人已經懂得这層道理，他們已經开始向資本家組織者，向工程师領導

1) “列宁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册，82頁。

者，向技師專門家們學習了。“這些工人，‘在皮業總局’‘紡織業總局’這一類的中央領導機關內，同資本家聯席并座，向他們學習，辦理托拉斯，辦理‘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就是社會主義的前門，社會主義堅固勝利底條件。”<sup>1)</sup>

同時，由於我國原來資本主義不發達，原有的民族工商業基本上都是屬於中小工商業。根據1955年公私合營和私營企業中資本家投資人數的統計：投資在10萬元以上的人數，只占總投資人數的1.049%；而投資在一千元至一萬元之間的投資人數，則占總投資人數的82.5%。由於基本上是中小工商業，因此資本家中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脫離直接的生產和經營的活動。也就是說，那種“資本家本人除了撈進款，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相互爭奪資本的交易所中投機以外，再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活動了”<sup>2)</sup>的資本家，在我國民族工商業中只是極少數。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以資本家的身分，長期參加了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的活動，其中也有不少的事業家、專家和有經驗的生產與經營的組織者。因此在我國條件下，不可忽略資產階級分子的作用，必須通過對他們的改造，以致向他們學習，把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知識中一切有用的因素，當作社會遺產全部繼承下來。而這一切，也就正是發展共同工作關係的基礎。

總之，所謂搞好公私共事關係就在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提高生產和經營服務；進一步實現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發展合作互助的共同工作關係，使這種兩重關係逐步轉變為單一的共同工作關係；完成這一消滅階級和個人改造的最後過程。

最後，在公私共事關係中的二重關係，是不可分離的，是相互結合的。當我們說到共同工作關係時，也就意味著還有階級關係；反之，當我們說到階級關係時也就意味著還有共同工作關係，因此二者之間，不能作片面的理解。在工商業者中間有的人，只談共同

1) “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冊，83頁。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中文版，下冊，147頁。

工作关系,不談階級关系,因而只談監督不談領導;只講團結不講改造;只要求鼓勵不談批評,这是錯誤的。这种思想是資產階級本質的反映,这种观点不利于進一步接受改造。当我们說共同工作的关系是主要的,并不是說階級关系就已經不存在或不重要了。这里乃是說,應該共同努力來發展共同工作的关系,同时也只有正确地認識了这种階級关系,以及資產階級的消極性,才更有利于發展共同工作关系的一面。总之,任何片面的理解都是錯誤的。

## 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 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国的勝利

实现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把資產階級和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我國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專政，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开始担負了这方面的任务。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經過农業合作化的高潮和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高潮以后，这方面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至1956年6月底止，除了整个資本主义工商業基本上实行了全行業公私合营和定息以外，参加农業生產合作社的农户总数已占总农户的91.7%，其中高級社占62.6%；全國个体手工業者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產合作社的已达总計的90%。就是說，我國过渡时期，对資本主义工商業，以及对农業和手工業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已經基本上完成了；作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經取得决定性的勝利了。于是，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就开始發生了主要的和基本的变化，首先是我國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形势發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進一步巩固，工人階級的階級斗争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我國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形势，發生了基本的变化了。国内主要矛盾也轉換了。

由于我國革命的特点，我國过渡时期的階級斗争表现为如下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工人階級为領導、工农联盟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同一切已被推翻的反革命階級之間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內部，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

階級之間的鬥爭。在农村还有同富农的鬥爭。对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專政是主要手段，統一戰綫內部的階級鬥爭，主要手段是說服教育。但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綫越巩固，一切反革命敌人越孤立，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现就越順利；反之，社会主义改造越深入，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借以活动的社会基礎就越被縮小，反革命分子就更加被孤立了。

首先，这个統一戰綫內部的階級鬥爭，即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已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资本主义生產关系的基本改变，以及資產階級中絕大多数人接受了國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趋于緩和了。虽然資產階級还没有最后消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和鬥爭仍然存在，但比起以前則緩和了。

其次，从对反革命敌人的鬥爭來說，几年以來在國家的領導下，經過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鎮压反革命运动，以及肅清反革命运动等等，反革命殘余势力已經大大削弱了。加之几年以來，國內和國際政治和經濟的形势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强大；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空前提高；統一戰綫內部的階級鬥爭也趋于緩和；社会主义建設和改造戰綫上的偉大勝利；以及日益有利的國際形势等等。于是随着这种形势的發展，在社会基礎和思想基礎上，反革命势力更加孤立，反革命內部也开始出現了分化，原來的反革命階級分子經過了几年的劳动改造，也正在發生着变化。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越來越感到困难，因而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确，反革命分子是可以肅清的，那种認為反革命活动会越来越嚴重的想法，是沒有根据的。但是，反革命分子却仍然是存在着，因此也不能認為就可以放松警惕，以至認為可以削弱專政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任何时候也都是必需的。总之，如果人們看不見敌人的力量，对敌人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計，固然要犯錯誤；但如果过多地誇大了敌人的力量，也会導致另一嚴重的后果。反革命的殘余力量有多大就估計多大，不应附加以任何主觀

成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基礎的深刻改变以后，國內反革命力量是大大削弱了。

再次，由于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工农联盟進一步巩固，貧中农之間也达到了進一步的团结，于是使那些富农分子、过去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等等，已經陷于完全孤立，因而就为進一步通过和平方法来改造富农，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由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發展，已使富农不得不放棄剝削。富农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們中許多人已認識到合作化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并逐漸認識到加入合作社比不加入合作社有利。由于各种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因此在富农中間也出現了分化。在新的条件下，國家采取了分別对待的办法吸收他們入社，把他們放在合作社里面來繼續改造。因此整个农村的階級斗争形势也發生了重大的变化。

于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們國家內部的主要矛盾，就已經不再是階級矛盾，即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争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变为：生產关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 and 基礎之間的矛盾表现为人民內部的矛盾。但在一定时期內，人民內部的矛盾中也还有一小部分階級矛盾。而这种矛盾的性質，則已經不再是根本利益相反的矛盾，因而可以当作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

我們國家还存在着外部矛盾，即还存在着同帝国主义國家之間的矛盾，我們國家还存在着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为了保衛我們的祖國，我們还必须繼續加强我們的國防，以及加强我們的國防軍；必須警惕帝国主义的陰謀，及其發動战争的可能性。但只要社会主义各國和世界上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爭取世界和平和人类進步而進行不懈的斗争，战争也不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在新的条件下，保护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务，把我國由落后的农业國变为先進的工业國的任务，就成为全党和全國人

民的主要的和中心的任务了。

作为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的建成，以及最后完成國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來說，我們虽然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还没有完成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而这一点正是我國人民長期以來的願望。同时这个任务之所以到今天才突出为我們國家的主要任务，乃是因为：如要發展生產力，必須首先解放生產力；如要实现國家的工業化，就必须完成兩個階段的革命。也就是說，必須在克服了中國人民大众同帝國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資本之間的矛盾以后，再克服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才能最后解放社会生產力，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和進一步發展社会生產力創造前提。当我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業基本上完成以后，我們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來提高我們國家落后的生產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为資本主义扫清了障碍，为社会主义創造了前提。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則为社会主义扫清了障碍，最后解放了社会生產力，为發展生產力和進一步提高劳动生產率創造了前提。在这兩個階段的革命中，主要矛盾的克服，都在于改变腐朽的和落后的生產关系，从而排除了一切發展生產力的障碍。如果不改变生產关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所以生產关系的变革，在这个时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們不迅速实现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改变生產力的落后狀況，社会主义就不能最終地巩固和取得最后的勝利。因此可以說，團結一切力量为实现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而斗争，实现國家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就是我國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就是过渡时期的終結；就是我國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最后完成；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我國的最后勝利。

在第一階段革命中，主要是通过武裝斗争，用推翻反动政权和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來克服当时的主要矛盾。因而第一階段革命的完成，就同时解决了第二階段革命的根本問題——政权問題。于是第二階段革命中，也就有可能通过和

平改造的方式，達到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的目的。但以前階段兩個主要矛盾的克服，主要在於用消滅階級和變革生產關係的方法，主要在於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放生產力。在新的發展階段上，則要求保護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要求我們提高建設能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工作水平。

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沒有高度設備的大工業，就一般談不到社會主義。

可是，我們是在異常落后的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們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我們要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則需要更長的時間。在舊中國，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很低，而且主要是輕工業。戰前即 1936 年，生產資料的生產在全部工業中只占 28%，經過十多年的戰爭年代以後至 1949 年，還下降為只占 26.6%。因此在舊中國，關於冶金、燃料、電力、機器製造、基本化學等等重工業，都缺乏最起碼的基礎。單拿鋼鐵工業來說：英國在 1913 年鋼的產量就達到了 766 萬噸；同期，美國 2,883 萬噸，我國到 1949 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年，全國生鐵產量只有 24.6 萬噸，鋼的產量只有 15.8 萬噸。這還只是以絕對數字來比較，如果從人口的平均數來計算，那就更少了。至 1955 年如以鋼的產量按國家人口總數平均計算，則美國鋼的產量平均每人 642.5 公斤；英國 396 公斤；法國 290 公斤；日本 108.1 公斤。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 226.3 公斤；波蘭 161.3 公斤；捷克 330.7 公斤。至於我國在 1955 年鋼的產量平均每人只占 4.7 公斤，這個距離就實在太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巨大的努力，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 1949 年至 1955 年，我國工業總產值的發展，年平均增長速度達 26.8，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年平均增長 37.1；消費品生產年平均增長 21.1。同期在重工業的主要產品產量方面，電力年平均增長 19.2；原煤 20.3；生鐵 56.6；鋼 62。現在估計，到 1957 年底，鋼的年產量將達到 550 萬噸。從



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在五年內增長91.3%，這個指標在1956年就已經達到了。在這個發展的基礎上，我國科學、技術和文化水平，以及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也都有相應的提高。顯然，這個發展的速度是空前的，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達不到的。

不過，發展的高速度是一回事，這表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已經達到的水平又是一回事。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當然是先進的，但我們現實的生產力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比較又毫無疑問是落后的。我國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機器設備，還有40%不能自給；我們還一般地不能製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許許多多高級合金鋼還不能生產，有色金屬的產品種類很少；鋼材的生產在數量和品種上也大大不能滿足需要；有機合成化學工業還幾乎等於沒有。總之我們還沒有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解決這些任務。

但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前一個主要矛盾的基本克服，使我們有可能集中一切力量為克服當前的這個主要任務而奮鬥：第一，工業、農業和商業中，都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這個國民經濟中的消極因素基本上消除了，為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造成更有利的條件。第二，農業的合作化，為農業採用新技術創造了前提，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因而也就大大支持了工業化事業。第三，全行業公私合營和實行定息辦法，為進一步利用工商業者的技術經驗和才能創造了新的條件。他們中多數人也逐漸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了。以及工人階級、勞動人民中間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高漲，知識分子中間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礎更加擴大和鞏固，國際上社會主義國家團結一致，和平民主力量日益擴大等等。因此為了實現當前的這個主要任務，就需要利用這一切有利條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所以劉少奇同志指出：“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

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sup>1)</sup>這也是我國全體人民的任務。

但作爲發展和提高生產力這個任務本身來說，則是更爲艱巨的。除了首先要保證大工業的物質基礎外，還需要一些條件：第一，就是要發展科學，使我國科學水平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迅速培養科學技術幹部。我們國家對這一點已給予了極大的注意，制定了12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第二，要求人民文化教育的普遍提高，我們國家已經採取了各種措施，并首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掃除文盲的工作。第三，還需要提高技術、改善勞動組織、提高管理水平、加強勞動紀律等等。我們目前在這些方面也都存在着落后狀況，改變以上各方面的落后狀況，也是提高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必要條件。就是說，要全面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還必須造成經濟、科學和文化方面的普遍高漲。

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還需採取正確的 policy。爲了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必須建設大工業，就必須增加國家的資金積累，因而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必然要出現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實質上也就是反映了人民內部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以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經指出：必須繼續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但“必須使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改善這兩個方面得到適當的結合，也就是使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得到正確的處理。”<sup>2)</sup>爲了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一方面必須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目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艱苦奮鬥，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增加國家的資金積累；另一方面，如果不注意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適當改善人民生活，不注意人民羣衆當前

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版，4頁。

2)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損害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因而也就同样地損害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因此只有正确地对待这些关系，才更有利于工業化事業的实现，也就更充分地表现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是，在進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同时，我國人民还必須为解放台灣而斗争；为繼續肅清反革命殘余而斗争；为徹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滅階級而斗争。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也是同保护和發展生產力的斗争分不开的。但在当前階段起領導和决定作用的，則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生產力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胜利，又影响和規定其他矛盾的徹底解决或逐步解决。

同时，随着我國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們國家的职能和任务也發生了新的变化。任何國家都是階級的專政，过渡时期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同样任何國家也都具有民主与專政的兩方面，我國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專政，則是以工人階級为首的人民群众对于反动階級、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剝削者的專政。因而“我們的民主不是屬於少数人的，而是屬於絕大多數人的，是屬於工人、农民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愛國的人民的。”<sup>1)</sup>因而我們的國家有兩個方面的职能和任务：一个是專政的任务；一个是組織社会生活的任务。當我國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階級斗争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已經退居次要地位的时候，專政的任务就有所减少，組織社会生活的任务就要越来越大了。在新的条件下民主的范围也相应地擴大了。因此，“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新形势，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sup>2)</sup>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專政，進入了一个新的發展階段，目前專政仍然存在，但比前一階段縮小了。但

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41頁。

2) 同上，47頁。

这决不能認為因而就要削弱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而是說在新的条件下進一步擴大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我們有条件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通过民主生活的進一步擴大，因而又進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專政。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更需要加强党的領導，加强全國人民的團結一致，加强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及加强共產主义教育。如果不繼續加强人民民主專政，就不能保衛劳动人民的革命果实，就不能最終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总的說來，我國过去七年多以來的革命實踐和它的成就，完全証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一般地談不到社会主义。对于实现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來說，“这样的政权實質上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無產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党，毫無阻礙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把全体劳动人民和其他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力量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共同执行無產階級的政策路綫，一方面組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經濟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鎮压反动階級和反动派的反抗，防衛外國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嚴重复雜的任务。”<sup>1)</sup>因此我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形式，虽然有它具体的發展特点，然而它仍然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但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体系中，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業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針，而这种統一戰綫的形式既是階級斗争的一种形式，又是最广泛地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形式。因此在我國：“最广泛的統一戰綫和最广泛的愛國主义團結，不但沒有損害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而且有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巩固和發展。”<sup>2)</sup>这便是我國过渡时期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經驗，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基本特点。

---

1)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人民出版社版，41頁。

2) 同上，46頁。

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毫无疑问，我们将更快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不仅将要彻底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而且将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原理在我国的胜利，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各个国家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胜利。

归根结底，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但它只能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任务的特殊形式，和平改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也就是说，普遍的东西只能寓于特殊的东西之中，只能通过特殊的东西来表现自己；反之，特殊的东西中间也有其普遍的联系，特殊不能导向于那普遍的联系之外。所以说，我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胜利，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的胜利。